

1923年「科玄論戰」前張君勸對歐戰四個看法之嬗變及其批評

葉其忠

摘要

研究張君勸的思想所碰到的最大困難是它的嬗變、混淆、甚至前後矛盾。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並不只是因為他的思想成分相當複雜，包涵中國傳統儒家（尤其是理學）、西方（尤其是德國）思想，也同時由於他無法清楚表明他在此一時或彼一時，甚至同一時期要信從何種互為衝突的思想。因此，當他所處的思潮在短期內有巨大轉移時，他的思想中的嬗變、混淆或矛盾現象即跟著加深。這個現象在研究張君勸的論著中，常有意無意被忽視，因此格外值得強調。

本文的目的在於指出張君勸思想裡的種種嬗變、混淆或矛盾也一樣出現在他對歐戰的看法上。

按時序先後簡言之，他對歐戰第一個看法是把它當做鞭策中國往富強之路之借鑑（可稱之為「富國強兵」之鑰）；第二個看法是把它當做中國躋身世界之林的機會（可稱之為「對德、奧宣戰」之必要）；第三個看法是把它當做歐洲文明危機與社會主義到來之諍言（可稱之為「社會主義」之講求）；第四個看法是在《國憲議》中把社會主義與中國文明復興之契機連在一起（可稱之為「社會主義和儒家世界」之未來）。第五個看法可看成是「科玄論戰」的問題，已於他文相當詳細討論了，故本文主要談論前四個看法。

張君勸對歐戰的第一個看法和第四（第五）個看法簡直是南轔北轍，完全相反。在第一個看法裡，他對科學應用，更遑論科學精神，沒有絲毫的批判。在第四（第五）個看法裡，他對科學精神，更遑論科學應用，有極強烈的批判。在第一個看法裡，他對社會主義雖有欣賞，但仍止於理解和注意的階段，到了第四（第五）個看法時，則一反過去對科學應用之歌頌，轉而歌頌社會主義。

至於介乎其間的第二、第三個看法，以第二個看法受時空的限制最大，因為它大致限於權衡時局的判斷；第三個看法則已含有第四個看法之雛型，雖它也與時局有密切關連。

綜觀張君勸的四個看法，我們雖可以辯護說，其嬗變皆有當時的情勢和思潮的軌跡可尋，但問題是，張君勸在提出一看法時所想捕捉的情勢和思潮並不一定就是主流，所以後來會有看法上的嬗變。但嬗變後的看法又被緊接著而來的新情勢和思潮的發展所推翻。若以思想家的標準來看，則顯示張君勸並沒有先見之明。但就張君勸抱持每個看法之強度與變化速度之快，以及他後來的悔悟之深而言，仍是值得注意，也很值得吸取教訓。

關鍵詞：張君勸歐戰看法之嬗變

On Chang Chün-mai's Changing Views on WWI before 1923

Yap Key-chong

Abstract

One of the big difficulties in the study of the thought of Chang Chün-mai lies in its variety, confusion and even contradictions. The causes for these are not simply to be attributed to the complicated elements that he derived from both traditional Chinese Confucian (especially new Confucian) and Western (especially German) thoughts, but also that he was not able to make clear what he wanted to hold onto among various conflicting thoughts. Thus, when he was faced with tremendous change in trends of thought in a short period, the varying, confusing or even contradictory state tended to deepen. This is a point that has been neglected unintentionally or even on purpose by scholars in the study of Chang's works, and thus deserving emphasis.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show that the sort of variety, confusion or contradictions that are to be found in Chang's thought are also found in his views on WWI.

In rough chronological sequence, and in brief, Chang's first view on WWI was to regard it as a god-sent golden message and lesson to impel China to seek out ways and means to become a rich and powerful nation (this may be called

“the key to the nation’s strength and power); his second view on WWI was to regard it as an opportunity to join the world of nations with equal status and dignity (this may be called “the necessity to declare war on Germany and Austria”); his third view on WWI was to regard it as a crisis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and as a harbinger to socialist society (this may be called “the advocacy of ‘socialism’”); his fourth view on WWI is contained in his book “On National Constitution” informing an attempt to collapse socialism with the chance to revive China’s civilization through regeneration of Confucianism (this may be called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and Confucian world”). His fifth view on WWI can be regarded as the question of “the polemic on science and metaphysics”. This article only deals with the first four views, as the last one has already been dealt with in another article.

Chang’s first view on WWI is in diametrical opposition to his fourth view on WWI, not to say the fifth one. In his first view on WWI, he was not critical at all about the application of science, not to mention the spirit of science. While in his fourth view on WWI, not to say the fifth one, his criticism of both the application and the spirit of science reached its peak. Moreover, in his first view on WWI, though he was appreciative of socialism, this stopped short at the stage of attention and understanding, but when he reached his fourth and fifth views on WWI, he had reversed his praise of the application of science for a glorification of socialism.

We notice that between the two contradictory views on WWI, there were his second and third views on WWI. His second view on WWI was confined to a larger extent than the other three views by the contingency of the time and place, for obvious reasons, and was thus a sort of judgment intended to take full account of the circumstances China was then in. So was his third view on WWI, though it already contained fledgling elements of the fourth view on WWI.

In sum, though we may argue that the changes as found in Chang’s four

views on WWI were all attributable to the situation and currents of thought of the time, the question remains that there was no necessity accountable for Chang's holding those four views on WWI, in fact, a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tuation and currents of thought unfolded, Chang's views could not endure for long, each being qualified, replaced, or contradicted either by the one immediately succeeding it or by a combination of those he subsequently held. As judged by the standard of a thinker, it is shown that Chang did not have foresight on what were to come.

Key words: Chang Chün-mai's Changing Views on WWI

1923 年「科玄論戰」前張君勸對歐戰四個看法之嬗變及其批評

葉其忠*

- 一、前言
- 二、第一個看法（約自 1913 年春至 1916 年春）：為中國尋求富國強兵之借鑑而讚嘆歐戰及其批評
- 三、第二個看法（約自 1916 年初至 1917 年底）：為中國爭取權益而極力鼓吹對德、奧宣戰及其批評
- 四、第三個看法（約自 1918 年初至 1921 年初）：因巴黎和會之失望、山東問題之懸案、五四運動之激盪與世界思潮之影響而信從社會主義及其批評
- 五、第四個看法（約自 1921 年初至 1923 年初）：為回歸中國傳統而在《國憲議》上鼓吹社會主義及其批評
- 六、結論

一、前言

張君勸(1887-1969)是現代中國史上相當重要的人物，研究他的思想所碰到的最大困難是它的嬗變、混淆、甚至前後矛盾。這種混淆或矛盾甚至出現在同一篇文章裡。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並不只是因為他的思想成分相當複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謹藉此向編委會及匿名審查人諸先生女士之辛勞和斧正，表示萬分謝意。此外，作者也想藉此向同事呂妙芬博士和編委會祕書李怡嬌小姐兩人在細膩的文字修飾工夫上所花的時間，表示感佩。

雜，包涵中國傳統儒家（尤其是理學）、西方（尤其是德國）思想，也同時由於他無法清楚表明他在此一時或彼一時，甚至同一時期要信從何種互為衝突的思想。因此，當他所處的思潮在短期內有巨大轉移時，他的思想中的混淆或矛盾現象即跟著加深。這個現象在研究張君勸的論著中，常有意無意被忽視，因此格外值得強調。彌爾有云：「在這意見嬗遞的時代，若能銘記任何一個不斷往前衝，並準備從自己的、或他人的思想中學習或修改自己思想的思想家的每個階段的變化，將是既有趣且有益的事。」¹羅素也告訴我們：「哲學家既是因也是果：是其時代的社會環境、政治及體制之果；是塑造（若他們有幸）將來的政治和體制的信仰之因……就真理所允許的範圍內，我將盡力展現每個哲學家是其環境的產物，他以其做為其社群的一分子，把其所在的社群中那共同的、但模糊和散亂的思想與感覺，加以結晶並集中於其個人身上。」²以上二段引言是本人研究思想史和觀念史的座右銘，也是本文努力的方向，目的在於指出張君勸思想裡的種種混淆或矛盾，也一樣出現在其對歐戰的看法上。

無庸諱言，本文所談的對歐戰的看法，對中國當時關心時局的知識分子而言並不陌生，³但張君勸抱持每個看法之強度與變化速度之快，以及他後來的悔悟之深，卻更值得注意，而且也很值得吸取教訓。按時序先後簡言之，他對歐戰第一個看法是把它當做鞭策中國往富強之路之借鑑（可稱之為「富國強兵」之鑰）；第二個看法是把它當做中國躋身世界之林的機會（可稱之為「對德、奧宣戰」之必要）；第三個看法是把它當做歐洲文明危機與社會主義到來之諍言（可稱之為「社會主義」之講求）；第四個看法是在《國憲議》中把社會主義與中國文明復興之契機連在一起（可稱之為「社會主義

¹ 譯自 J. S. Mill, *Autobiography*, ed. by Jack Stillinge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3.

² 譯自 B. Russell, "Preface" to his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55), p. 7.

³ 歐戰前後和歐戰期間，中國知識分子曾發表了大量相關的報導和分析文字。單以《東方雜誌》而言，幾乎無期無之，粗略的印象有數以百計（參見王雲五主持，《東方雜誌全部舊刊總目錄》（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年））。

和儒家世界」之未來）。第五個看法是「科玄論戰」的問題，已在他文⁴相當詳細處理了，故本文主要談論前四個看法。

本文除本節（即第一節）外，第二節談張君勸對歐戰的第一個看法，及其直接的背景，即他被迫離國赴歐留學，因而有緣目睹歐戰的頭二年的反應；第三節談張君勸對歐戰的第二個看法，即他趕著回國的情形，以及他歸國後把所謂德國必敗的看法應用於為國家爭取權益上的得失；第四節談張君勸對歐戰的第三個看法，即他第二次歐遊觀察歐戰結果時，因接觸當時最流行的思想之一——社會主義，而對歐戰看法上翻然的轉變；第五節談張君勸對歐戰的第四個看法，即張君勸如何把第三階段的看法融入到他為中國擬想的憲法方案中，以及他開始回歸到中國傳統中去找尋最後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案；第六節是總結。

二、第一個看法（約自 1913 年春至 1916 年春）：為中國尋求富國強兵之借鑑而讚嘆歐戰及其批評

富國強兵是近代中國面臨西方挑戰時最根本的反應，也是張君勸對歐戰第一個看法的基礎。這可從他後來曾總結留日、德的經驗中見之。⁵其實，張君勸的一生，正如他的二弟公權（嘉璈）所說的，始終「致力于學問和寫政論文章」⁶，並在一有機會（或必要）時即介入實際政治活動。本文所討論的是自他留日回國後以及二次留歐期間，前後的十一、二年間的情形。

張君勸是在 1910 年自日本學成回國，只不過兩年，即不得不因為文得

⁴ 葉其忠，〈從張君勸和丁文江兩人和〈人生觀〉一文看 1923 年「科玄論戰」的爆發與擴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以下簡稱〈「科玄論戰」的爆發與擴展〉），期 25（1996 年 6 月），頁 211-267；〈1923 年「科玄論戰：評價之評價」〉，《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6（1996 年 12 月），頁 179-234。此二文為作者構想中有關「科玄論戰」專著之部分。

⁵ 張君勸，〈我從社會科學跳到哲學之經過〉，原載《宇宙旬刊》，卷 3 期 11（1935 年 12 月 25 日）。今引自程文熙編，《中西印哲學文集》（二冊），上冊（台北：學生書局，1981 年），頁 65。

⁶ 張公權，〈我與家兄君勸〉，《傳記文學》，卷 14 期 4（台北：1969 年 4 月），頁 71。

罪袁世凱，而於 1913 年 1 月經俄，於三月間抵德留學，直到 1916 年 3 月，應梁啟超倒袁救國之邀趕回中國。在這段三年多留歐時間是張君勸發表對歐戰看法的第一時期。他之所以留歐的直接原因是因為他在回國後不久曾歷數袁世凱的「十大罪狀」。⁷這就是張公權所說的，「在袁世凱稱帝期間〔原文如此〕，家兄以其倒行逆施，為文痛貶，因而觸怒于袁，被迫出國。」⁸張君勸不見容於袁氏一事，他自己有記載云：

民國成立以後，因為外蒙問題，我在《少年中國》（民元所辦）報上做了文章宣佈袁世凱罪狀，無法安居北京，朋友中如張仲仁勸我到德國去。一九一三年春動身，到柏林留學，途中在俄國住了二三月之久。⁹

至於張君勸為甚麼會想到留德，他自己說是「因為我在日本聽各教授說，他們都讀德國書籍。課本中，有用德文。我想，既然如此，我何不逕自到德國去求學呢？這樣，我就決心去德了。」¹⁰1967 年張君勸曾對他整個留德經驗有最精簡的概括：

我到德國後，我不僅對哲學與政治有興趣。我也對德國的軍事，很有興趣。我於一九一三年到德後，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大戰起，我曾經到比國戰場去參觀過。及戰事結束，我曾從比國盜浮埠，循公共汽車路線，直到阿爾薩斯洛林，觀察大戰中作戰之地。我自問對於戰事亦有興趣，所以把德國魯屯道夫將軍《全民戰爭論》翻譯出版。我對於希特勒的民族社會黨，雖亦加以注意，但在希氏柄政前，我已離德返國。¹¹

⁷ 此內容可見於程文熙彙集，〈君勸言行錄〉，頁 14-15。此言行錄收在王雲五等著，張君勸先生七十壽慶紀念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張君勸先生七十壽慶紀念論文集》（台北：張君勸先生七十壽慶紀念論文集編輯委員會，1956 年）。

⁸ 張公權，〈我與家兄君勸〉，頁 71。

⁹ 張君勸，〈我從社會科學跳到哲學之經過〉，頁 64。

¹⁰ 張君勸，〈社會主義思想運動概觀〉（講於 1967 年）（台北：張君勸先生獎學金基金會，1978 年），頁 6。

¹¹ 張君勸，〈社會主義思想運動概觀〉，頁 6。

本大節重點是在他首次留德返國時有關歐戰的心得。張君勸初次赴德時是廿七歲。他是「受北京『憲法新聞社』聘為德國觀察員於〔1912〕年底由任公先生之助，經俄入德，於次年三月考入柏林大學再學政治學及國際法兼研究德國哲學。途經莫斯科與俄記者作長談，被譽為中國赴歐第一記者。」¹²

根據張君勸後來的回憶，「自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三一年十九年間，我之履俄土者三。」本文對他的三次訪俄的心得都會提到。本節先談他第一次訪俄的心得，因為他於此透露了對歐戰可能爆發的看法。他說：「一九一三年赴德留學，居俄故都〔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歲月，因表兄劉士熙星使之介紹，得識其立憲民政黨〔Constitutional Democrats, or Cadets〕首領米呂歇夫氏(Paul Miliukov)以及其他朝野人士。且值羅曼諾夫〔Romanov〕皇室登位三百週年紀念〔1613-1913〕，對街市喧鬧的盛況，至今猶在心目之中。先是俄所認為斯拉夫人種之領土，曰波斯尼〔即波士尼亞，Bosnia〕，曰海華哥維納〔Herzegovina〕為奧所併，故當時頗聞兩國戰機繫於一髮。賽爾維亞恨奧尤深，一年後卒有刺奧皇儲之舉，而世界大戰旋起。」¹³

若張君勸此時（即第一次歐遊）經蘇赴德途中，已正確地感覺到民族衝突是接下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主要原因之一的話，則他在三年多後因討袁稱帝而趕回國後，於民國五、六年間極力鼓吹參戰時期中所提的理由裡，似乎是暫時不考慮和忽視此點。¹⁴這不但使我們因他後來（即第三和第四個

¹² 程文熙，《中西印哲學文集》編後記，頁1486。參見王雲五等著，《張君勸先生七十壽慶紀念論文集》，〈君勸言行錄〉，頁14。

¹³ 張君勸，《史大林治下之蘇俄》（1933年初版）（台北：商務印書館，1971年），〈自序一〉，頁1。此書原出版於1933年。參見江勇振，《張君勸》，見於王壽南總編輯，《中國歷代思想家》，冊10（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以下稱江勇振，《張君勸》），頁23。

¹⁴ 對照他在中國宣戰之前和之後，如下與赴歐初期一致的看法：(1)1916年初他曾寫到：「戰爭之起由於萬國林立與夫民族競爭之烈，可以見歐亞兩洲立國之異……」（見張公權，〈我與家兄君勸〉，頁71；王雲五等著，《張君勸先生七十壽慶紀念論文集》，頁102；《張君勸先生大事記》，頁84）；(2)1919年秋，他也說：「特別同盟與生計競爭為世界相仇恨以成戰爭之大原因，非以特別條文廓清之，則和局決不鞏固。」見君勸，〈平和會議中威爾遜之成功與失敗〉，《解放與改造》，卷1號2（1919年9月15日），

歐戰看法裡）對歐戰全面否定的判斷而質疑他此時（即第一個歐戰看法裡）對歐戰意義和教訓之歌頌是否明智，也使我們因他（即第五個歐戰看法裡）對參戰後果深表失望而質疑他（第二個看法裡）鼓吹參戰是否判斷錯誤。不僅如此，此時他忽視歐戰的真正因由，也與他在戰後為觀察巴黎和會而再次訪歐時的反省（即第三個歐戰看法）有天淵之別。尤甚於此者，他第二次歐遊，以及回國後（即第五個看法裡）所發表的種種導致「科玄論戰」的言論，清楚透露了他已全盤推翻了自己第一次歐遊時所觀察的歐戰之意義與教訓。我們在下面會在適當的地方對此一一詳加剖析。

現在就讓我們進一步看一看他第一次留歐近三年（尤其是在德國）時對歐戰的看法。他告訴我們「一九一四年秋，歐洲開戰，我的心緒轉而研究各國戰事的勝敗前途如何，至於經濟學、國際法等，已不能使我發生興趣了。我在歐戰之初，目擊德國動員，領過麵包票，也曾到過比利時戰場去參觀。¹⁵當時許多中國留學生紛紛返國以免遭受池魚之殃，相反的，張君勣決心留德觀戰，並顯露出無比熱心。¹⁶在他後來的回顧裏，我們仍然可以感受到他的關注和興奮。他寫道：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歐戰爆發，我正在德國求學；那麼〔時〕外面流傳日本將幫助俄國對德宣戰，因而黃面孔的人在街上跑，動不動就會有凳子椅子從屋子裡擲出來。我國許多留學生就覺得太不舒服，紛紛回國。而我卻覺得人生一世能〔難〕見到幾次大戰，決定趁此機會留德觀戰。

從開戰起，我買了許多地圖書籍，每天研究戰事的進展。那時每天

頁 76。又參考「此次歐洲大戰之真因，要在大日耳曼主義與大斯拉夫主義之衝突，此人人所能知之而能言之者也。」見章錫琛、錢智修、高勞、甘作霖、胡學愚合編，《歐戰發生史》，東方文庫第四種（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年12月），頁1。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是二十世紀最強大的力量，沒有任何其他主義或烏托邦可以與它抗衡，參見Isaiah Berlin, "Nationalism: Past Neglect and Present Power," *Against the Currents: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1982), ed. with a Bibliography by Henry Hardy,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oger Hausheer.

¹⁵ 張君勣，〈我從社會科學跳到哲學之經過〉，頁64。

¹⁶ 參見江勇振，〈張君勣〉，頁24-25。

有一位德國先生到我住處，替我補習德文。一天我在報上看見一條消息，說德國又有兩艘船被擊沈了，我便向那教師說：「你們德國到底有多少船，像這樣一天打兩艘，豈不要糟！」

忽然這時房門一開，房東太太跳了進去說：「今天我才斷定你是一個間諜啊！」我當時聽了，想她沒有什麼舉動，便也不去和她多說。不料到了飯時，我下樓出門去吃飯，卻被門口兩個警察攔住了，不准出去。原來房東久已懷疑我是奸細，那天竟去報告了警察廳。當時我便疑心兩個警察何以不上樓搜查我的房間。經我追問房東，才知道這是住宅自由，警察不能隨意搜查的。這便是外國人對於住宅自由的重視。普通警察在這種情形之下，尙能保持這種良好的習慣。同我國警察隨便出入人家者，相去何啻千里！

但是我總不能不吃飯，因此又去請教別人，在這種情形下應該怎麼辦，才知道惟有自己打電話給警察廳，聲明願意被搜，他們才敢來搜。當時我就打了個電話，不到一點鐘，警察廳派來兩名偵探，把我所有書籍抄了一張單子，其他東西也都一一搜查過，認為沒有嫌疑，撤去門口兩名警察，而這時午餐時候已過，我終於餓了一頓。¹⁷

錯過了午餐一事或許是張君勸留德觀戰初期的美談之一。但這種個別經驗絕不能做為德國人不會因參戰而有激化的態度。其實，上述同一引言中所述其他留德學生受不了「不友善的氣氛」而「紛紛回國」即是明證。因此張君勸決定繼續留德並沒有普遍性，反而說明他的個性中倔強或「固執」的一面。¹⁸個中動力是他那時對戰爭所帶來的結果存有反智主義、浪漫的憧憬¹⁹，

¹⁷ 張君勸，《中華民國民主憲法十講》（1946年初版）（台北：商務印書館，1971年），頁36-7。原書出版於1947年。

¹⁸ 張君勸雖一再強調他是有自己看法的人，並不因實際的利害而改變觀點，但就他對歐戰的看法而言，我們則發現他處處想要跟隨某些他中意的潮流，並想掌握它，可惜並不太成功且有矛盾。

¹⁹ 本文作者對此已在他文以張君勸自己的悔悟來說明。見〈「科玄論戰」的爆發與發展〉，頁231-232。茲為了存證和再次提醒讀者，張君勸曾有一個時期的確是個「反智主義者」，謹此把他最關鍵性的悔悟出處徵錄如下：(1)張君勸，〈張東蓀著《思想與社會》序〉（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年），頁1-3；(2)張君勸，〈哲學家的任務〉，《再生》，期248

以及把戰爭看成是中國尋求富國強兵之借鑑，或某種如江勇振所說的「福音」。²⁰

在談到張君勸的戰爭之借鑑或福音觀之前，我們先看一看德國社會黨人和德國知識界在戰爭初期的狀態，因為它對張君勸的歐戰（尤其是後期和戰後）的看法有極大的感染作用。²¹根據《東方雜誌》當時的一篇報導，「當戰亂勃發之初，歐洲平和將被破壞之時，各國社會黨，均各持其向日之主義，反對戰事，維持平和。然大勢所趨，彼等之勢力，究不能遏止戰亂之不作。」²²張君勸對於社會黨人在戰前和戰後期間的戰爭觀，在戰後也有類似的分析：「千九百十四年七八月之交，各國軍閥志得意滿之日，而社會黨乃惟有唯唯聽命。此則英法俄各國之所同，而德之社會民主黨亦不能外是焉。七月之末，德社會民主黨遭人至法，商量同盟罷工，其後俄先動員，德社會民主黨素疾首於俄之專制主義，方以一致對外為要義，故罷工之說，不久消滅。八月四帝國議會開會之日，德社會民主黨雖有不擔戰爭爆發之責之宣言，然於戰費之通過則一致投票焉。自是以迄於革命，社會民主黨（除少數例外）無日不在擁護政府之地位，戰事公債通過焉；勞動義務法令通過焉；政府之糧食行政，有求勞動組合者，則為之分責焉。故社會黨之與政府，其親疏遠近，視戰前有不可以道里計者。」²³張君勸後來回顧道：「德國政府自開戰之初，迄於最後的狀態，可分為三時期言之。第一，各方擁護時期。第二，徬徨歧路時期。第三，計窮力竭時期。」²⁴

（1949年1月24日），節錄見王雲五等著，《張君勸先生七十壽慶紀念論文集》，〈君勸言行錄〉，頁47；（3）張君勸，《陳應耀編《白沙先生紀念集》序》（1949年9月20日），節錄見王雲五等著，《張君勸先生七十壽慶紀念論文集》，〈君勸言行錄〉，頁45。

²⁰ 江勇振，《張君勸》，頁25-26。

²¹ 參見張君勸，《社會主義思想運動概觀》一書之第六講：「一次世界大戰前後之歐洲社會黨」。

²² 高勞，〈歐洲戰亂與社會黨〉，《東方雜誌》，卷13號2（1916年2月10日），頁47。

²³ 〈德國革命論〉（續），《解放與改造》，卷2號4（1920年2月15日），頁5；參見張君勸，《社會主義思想運動概觀》，頁27。

²⁴ 張君勸，《社會主義思想運動概觀》，頁214。參見John Horne，“Socialism, Peace, and

張君勸對德國社會黨人之掙扎有第一手的經驗，然而在他的第一個歐戰看法中不曾或不常提到，但到了後來（如此處所述者）則有大量的追述。但就張君勸第一個看法的時限與文字而言，他毋寧是忽視此大變革中反戰的伏流。

說到歐戰初期的德國知識界，司馬榕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在全國總動員的生動個案。他告訴我們：

第一次世界大戰初，在 1914 年 10 月，德國的科學界與文化界在軍國主義的影響下，發表一篇為德國發動戰爭辯護的〈告文明世界宣言〉(Aufruf an die Kulturwelt)。這份也被稱為〈93 人宣言〉的文告，上面簽名的共有 93 位，包括著名的科學家、藝術家、史學家、哲學家、詩人、哲〔文〕學家、音樂家等德國的社會菁英。此篇宣言的特色是，各段落的開頭均為 “Es ist nicht wahr” (It is not true)，每段內容都是為德國的軍事行動辯解。

這份名單幾乎網羅了當時德國的知名人士，包括：艾耳利希 (P. Ehrlich，1908 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以下省略諾貝爾三個字)、歐伊肯〔倭伊铿〕 (R. Eucken，1908 年文學獎)、費雪 (E. Fischer，1902 年化學獎)、哈柏 (F. Haber，1918 年化學獎)、豪特曼 (G. Hauptmann，1912 年文學獎)、黎納德 (P. Lenard，1905 年物理獎)、能斯特 (W. Nernst，1920 年化學獎)、奧斯特瓦德 (W. Ostwald，1909 年化學獎)、普郎克 (M. Planck)、侖琴 (W. Röntgen，1909 年物理獎)、維恩 (W. Wien，1911 年物理獎)、維耳史塔特 (R. Willstatter，1915 年化學獎) 等人。

有的簽名者「知行合一」，自己也投入戰場。在這 93 位著名人士之後，也有三千多名教授加入簽名行列，為這個宣言背書。

在此宣言上簽名的科學家，不僅大多是大師級人物，他們的人品與風格也多有令人欽佩之處。這些科學家應該不是想討好德皇威廉二

Revolution, 1917-1918" in Hew Strachan, ed., *World War I: A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27-238.

世或求得一官半職而表態的。或許在當時整個德國的人環境下，這些人也有「聰明一世，糊塗一時」的時候。

值得注意的是，有兩位知名人士不在簽名之列，那就是大數學家希爾伯特(D·Hilbert)與愛因斯坦；兩人中又以希爾伯特尤為難能可貴。因為愛因斯坦雖然身在柏林，但他擁有的瑞士公民身份，具有護身符的功用。²⁵

除了司馬榕外，無獨有偶，早在二十年代末人類學家 Robert Heinrich Lowie (羅伯特·路威) 已做了一個的回顧，不過他是集中在各國科學家間的民族主義熱情之衝突。²⁶梁啟超也注意到「各國交戰時之舉國一致」。²⁷

我們可以確實知道，張君勸留德時曾注意到司馬榕所提到的此名單，也知道羅伯特·路威所提到的事實，以及羅素出名的反戰言論和行為。²⁸司馬榕所敘述的許許多多第一流科學家和知識分子明目張膽為戰爭背書，並不保證德國在戰爭中能獲勝，因為其他國家也有同樣的民氣可用。²⁹但在中國連這點都沒有。這點梁啟超和張君勸在鼓吹參戰時沒有充分考慮到，或有意加以忽視。從張君勸的第三、第四個歐戰看法和「科玄論戰」爆發的觀點看來，上述為德國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背書的人中，最值得一提的人就是倭伊鏗，因他對張君勸的第三和第四個歐戰看法，以及「科玄論戰」中的人生觀看法（即第五個歐戰看法）可能最有影響，而張君勸也曾充分利用倭氏的看

²⁵ 司馬榕，〈聰明一世、糊塗一時的科學家？〉，《科技報導》，期 178 (1996 年 10 月 15 日)，版 21。此段最前面漏二行，補刊文字見《科技報導》，期 179 (1996 年 11 月 15 日)，版 17。

²⁶ Robert Heinrich Lowie (羅伯特·路威) 原著，呂叔湘譯，《文明與野蠻》（北京：三聯書店，1986 年北京第 2 次印刷）。此譯本曾於 1935 年出版。原書英文名題為 *Are We Civilized: Human Culture in Perspectiv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29), pp. 286-289。

²⁷ 見〈各國交戰時之舉國一致〉一文，《飲冰室合集·文集》，冊 12 (33 分冊)（上海：中華書局，1942 年），頁 24-26。

²⁸ 見張君勸，〈關於杜里舒與羅素兩家心理學之感想〉，《東方雜誌》，卷 20 期 8 (1923 年 4 月 25 日)，頁 73。

²⁹ 參見羅素原著，楊耐冬譯，《懷疑論集》（台北：志文出版社，1995 年再版），頁 22-23 上的評論。

法來批判所謂科學的物質文明。

話說回來，在德國的張君勸如何看待歐戰爆發後初、中期的衝擊和教訓？1916年春，他曾藉訪英時把英軍需大臣路德喬琦氏之軍火與戰爭觀加以摘錄發表的機會而大力陳述自己的戰爭觀。首先他認為從較深的層次，但仍不是最深的層次言之，近世戰爭中之操勝算者，必其國家能具備發達的國民教育、發達的兵工業與普通工業、以及發達的科學此三項。他寫道：

世界經一度之戰事，則與人類以種種之教訓。而教訓之所得，常視其國家與其人民之地位而異。地位而高，則所感受者深，地位而低，則所感受者淺。居今日之日，目擊國際間競爭之烈，類無不知國無兵力，不足自存。即有兵力而準備不充者，不足競勝。此所謂至淺之原則，不待深求而能知之也。其上者進而研求各國勝敗之故，曰德之所以勝而俄之所以敗者，由於俄之軍士之無智識也，由於俄之軍火不充足也，由於俄之無利器也。所以無智識，則國民教育不發達實爲之；所以軍火不足，則國內炮兵工業與普通工業不發達實爲之；所以無利器，由於平日科學不發達實爲之。於是其所得之結論則曰近世戰爭中之操勝算者必其國家能具備此三項者也。此雖較深矣，然猶未盡也。更進則研求歐東西戰場之形勢，德之西方之守勢軍，深溝高壘，輔以後方炮火之力，支持至一載有餘，而無間可乘。於是知科學發達時代濠溝戰法之可畏，乃至鐵道之重要，高炸彈(High explosives)之效用，飛機之游行自在，潛航艇之神出鬼沒。此雖已入於軍事之範圍，然稍留心戰報者猶盡人能道也。更進者，則研求攻圍炮（如德四十二生的大炮）與要塞之利害比較，機關鎗與來福鎗之效力大小，乃至濠溝之築法，兵士入溝之更番迭代。此純爲炮兵步兵專家乃至工程師之事，而非局外人之所知矣。由此言之，經此一戰而後全世之政治生計教育工商與夫軍事上之種種部分，其所得教訓，豈復巧歷所能計耶。然而若德若法若英之所傾注全力者，大抵在軍事之專門方面。至普通情規則置不問可焉。吾國則以國家之進化尚未足列於近世國之林，故所僅得者則立國之大義而已。曰國

之如何當愛也，國民之軍事思想如何普及也，軍械如何注重也，如是而已。此吾所以謂國與民之地位高者，其感受深，其低者則感受淺也。³⁰

以上張君勸大談教訓之深淺，並感嘆中國之「以國家之進化尚未足列於近世國之林，故所懂得者則立國之大義而已」，而以下則一反之，而談任何教訓和立國皆為相對的，且對所謂「深」與「淺」之意義有相當令人費解之解釋云：

雖然同此教訓而有深淺之異者，以自一定之立腳點上立論，乃生此區別耳。就教訓之本身言之，淺者何嘗不可為深，深者何嘗不可為淺。近世各國大政要端，大抵皆已舉備，所差異者不過程度。故愛國大義軍事思想云者，均為已經經過之階級。至其與戰爭關係最密，而方今之須臾不容緩者，無過作戰計畫軍械籌備諸問題。何也？去戰事近者，則所謂深者也。去戰事遠者，則所謂淺者也。吾國異是，欲語夫深者，則其前尚有數百應歷之階級，政治組織也，軍事行政也，軍人教育也，專門學術獎勵也，國民教育普及也。必此數者日起有功，然後能語夫外競語夫戰備。而戰略之如何定，軍械學如何深造，乃始有人注意及之矣。此則國家進化之順序，而勢之無可強者也。³¹

根據張君勸的自一定點上立論，和就教訓言之，他所謂「深」「淺」的教訓意義竟然可以完全相反！我們不得不問到底中國該汲取西方「淺」的教訓還是「深」的教訓的意義？或是「深」「淺」的教訓意義兼取？或是純以中國的觀點所見的「深」「淺」的教訓意義而取之？既以中國的觀點而言，到底是要先「淺」後「深」，還是先「深」後「淺」？又中西「深」「淺」的教訓意義如何兼取？這些都不易得到確切的答案。雖然如此，張君勸卻正

³⁰ 張君勸，〈英軍需大臣路德喬琦氏之軍火與戰爭觀〉，《東方雜誌》，卷 13 號 4（1916 年 4 月 10 日），頁 18-19。

³¹ 張君勸，〈英軍需大臣路德喬琦氏之軍火與戰爭觀〉，《東方雜誌》，卷 13 號 4，頁 19-20。

確地指出戰爭的影響是全面性的，並隨便列舉八點：

要之，處此大戰之中，無論自何方面，無不可以下一種之觀察。且本此觀察，以聳國民之聽，則無在不可有益於國，而進之於高明之境，一載以來，嘗略舉外交財政軍事上一得之愚以告國人。惟恨力薄任重，所言未能盡戰事現象之萬一。竊嘗獨居斗室，再四思量，以為苟得同志數人，立一歐戰研究會，分軍事財政外交社會四大部，各就所好，分科講求，則於今後中國國家之生活，有莫大之益者。有數事焉，戰爭之起由於萬國林立與夫民族競爭之烈，可以見歐亞兩洲立國之異，而掃除國民之天下觀念，一也。自表面言之，則為戰鬥員者，僅此臨陣之兵士耳，考其實際，則全國之工商家財政家工程家化學家乃至婦女工人，無在而非助戰之人。此可以窺一國之分子之不強固者，則國家本身萬無強固之理，二也。工業發達，自平日言之，則海外利權競爭之要具耳。乃孰知與戰事有莫大關係。方今英德兩國，凡機器工廠無一不製炮與彈，故全國一軍械廠也。若俄若土，則仰給外人，緩不濟急，此可以知工業與近世戰爭之關係矣，三也。所謂飛機，所謂潛航艇，所謂四十二生的大炮，皆德意志民族好學深思，窮極造物之奇而有得者，故謂此次戰爭為技術 Technic 戰爭可也。謂此次勝負為技術之勝負可也，則科學與戰事之關係為何如乎，四也。軍需之費，每日以數千萬元計，非有極大之富力者安足語此。吾人至今日方知各國所以於海外工商與投資之業不肯一步落人後者，凡皆為此大目的耳，五也。外交之縱橫捭闔，至今日而已極，各國所頒之白書紅書黃書，教人以無數法門，故可作外交三字經讀。更進而深求之，則列國之政策與將來之世界新地圖無不可即此而推，六也。凡此所言，僅及於軍事之相關者，而未及於軍事之本身也，歐東西兩大戰區之上，雙方軍隊不下三四百萬，視拿破崙戰時約增十倍，然東境之大開大闔，與西境之寸步不移者，正成一種對照。世有軍事參謀，窮其所以至此之由，則於戰略之學，可生無數新例，七也。飛機之效大顯，重炮之用日廣。凡軍隊之移

動與夫更番之法，迥與昔殊，布陣之疏密，前後戰線之分配，亦爲古所未聞。蓋自此一戰而後，世界之步兵炮工輜各種操典，當無不經一番更訂矣，八也。此八者特就其至易見者言之耳。若舉直接間接者而悉數之，則可以累千百而不能盡焉。聞之也之言教育兒童者，則曰實物教育。吾國人之於世界智識，其能免於兒童之誚者幾何？何幸大戰忽起，以翻天倒海之一勢，鼓盪吾人之耳鼓，雖至無識者，必取世界地圖，考各國疆界大小，戰區所在，茶前酒後，常以歐戰爲談資，此真所謂實物教育，而啓發吾人智識之最好機會也。此十餘國之大戰，雖不得謂絕後，要已空前。其所以昭吾數千年關閉自守之民族者，至深且遠。茲會之設，又安可以已乎。世有同氣，各抒所見，商榷進行，是所望於國人焉。³²

於此有二大點值得特別指出。第一點是此時張君勸對「天下」觀念之排斥。³³第二點是張君勸此時對科學應用之讚嘆。³⁴總之，從以上所引文字裡所述種種事跡看來，張君勸對歐戰第一個反應是歡迎它的到來，認爲中國可以從中學得許多難得的經驗與教訓。此外他也覺得這是種洗滌作用和改革契機——與許多參戰國初期的國民心理完全一樣。梁啓超(1873-1929)早在1914年底也曾如此認爲：「夫此次歐戰，其範圍瓦十數國，其導源遠者自數十年百年前，近者亦自數年前。蓋政治上學術上生計上種種因果關係，參伍錯綜，醞釀鬱積，千回百折，若懸崖轉食，以成今日之局。而自茲以往，新時代行將發生。舉凡一國家社會之組織行將大異乎其前。譬則蠶將化蛾，而中間必作繭結蛹，閱無量之苦痛。今亦全世界作繭結蛹之時也。吾儕生值此時，靜觀其蕃變劇嬗之跡。蓋天下趣味最饒之事，莫或過是矣。而吾中國

³² 張君勸，〈英軍需大臣路德喬琦氏之軍火與戰爭觀〉，《東方雜誌》，卷 13 號 4，頁 21-23。

³³ 對照張君勸在提出第四個看法時，「天下」觀念已成了讚頌的對象和理想。

³⁴ 參照梁啓超 1919 年間的評論：「真不料最可寶貴的科學發明給這班野獸一般的人拿起來戕殺生靈荒穢土地。」〈戰地及亞洛二州紀行〉，《梁任公近著》，輯 1 卷上（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 年），頁 208。當然，到了 1919 年，張君勸已完全同意梁氏這裡的看法，且有過之而無不及。

人者，雖曰幸超然立於事變之外，其直接所蒙影響不甚劇，而戰後之狂潮，勢必坌涌以集於我。譬之颶風方怒號於新加坡，則知其三日後必且簸盪以薄香港。而吾儕生斯土者，宜如何恐懼修省以應大變。此尤蚤作幕思所當有事。是故吾儕對於此次歐戰之研究，一方面可以得最樞禪之興味，一方面可以助長極健實之國民自覺心。其不容隔岸觀火之態出之也明矣。」³⁵

梁、張這種對歐戰之歌頌有何根據？有甚麼理由使他們如此興奮？稍為分析一下歐戰爆發的因由和後果，將能解釋本文所談的張君勸四個看法皆呈現一偏之見，且每個看法並沒有先見之明。

首先我們得記住戰爭的本質。戰爭自有人類以來即有之。³⁶布羅諾斯基 (Jacob Bronowski) 寫道：「戰爭，有組織的戰爭，不是人類的本能。是一種計劃周密、合作無間的盜賊。」³⁷羅素在《戰時的正義》一書中云：「持和平論者間大都以為大部分人民原來很是平和，僅為政客及新聞記者所煽惑而趨於戰爭；然而那班好戰的人，對此說法大施反對，謂人類本有「好勇鬥狠」趨向戰爭的本能，確是不錯；但非有適當的刺激以引起之，則此本能可完全隱而不現。本能與驥武者之陰謀，這兩件事為造成戰爭之必要條件；兩者中苟缺其一，則其餘一個就不能單獨作惡。」³⁸

張君勸在為中國前途謀出路時，似乎沒有充分考慮以上所說的戰爭的一般根源，也沒有充分了解以下所提比較具體的歐戰根源，或更正確地說，在為中國謀出路時，他有意無意地忽視歐戰的性質。

在《中國問題》一書中羅素有云：「對心理學家來說，西方文明是構

³⁵ 梁啟超，〈歐戰蠡測〉，《飲冰室合集·文集》，冊 12（33 分冊），頁 12。

³⁶ Lawrence H. Keeley 在 *War Before Civi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的 Preface, p. x 上寫道：“Warfare—the armed conflict between societies—whether its scale is large or small, is such a pattern and leaves very enduring effects. In this work, I have tried to muster a mass of evidence to convince not just archaeologists and historians but also the educated public that the notion of prehistoric and primitive warfare is not an oxymoron.”

³⁷ 見布羅諾斯基原著，漢寶德譯，《文明的躍昇》(The Ascent of Civilization) (台北：景象出版社，1977 年版 5)，頁 70。

³⁸ 太朴譯，《戰時之正義》(Justice in Wartime) (上海：商務印書館，1921 年)，頁 1。原書出版於 1916 年。

築在一種對過剩精力的理性化的假設上。我們的工業文明，軍事擴張，熱愛進步，宗教的熱誠，帝國主義，佔有慾與組織慾，全都起源於對活動的過度渴求。純為效率而盲目追求效率，不問方向，也不管最後的結果的信條，戰後歐洲已經對它發生懷疑了。事實上如果西方國家當初只要稍稍放鬆一些，不要那樣緊張，世界大戰是絕不會發生的。」³⁹

就第一次世界大戰而言，歐戰史家 Bullitt Lowry 告訴我們，在不同時候，歷史家曾提出至少十個戰爭的長期原因，其中大部分是言之有物，而有少數是愚蠢的。⁴⁰綜合這十個原因，Bullitt Lowry 認為，「長程的原因當然是因素，但它們在 1914 年並沒有迫使歐洲爆發戰爭。德國之創建以及伴隨而來的勢力不穩定造成了一個明顯的問題。德國與英國海軍的對壘威脅著和平也是明顯的，其他問題包括法國因 1871 年失敗之怨恨。帝國主義也造成國與國間之敵對，縱使這並沒有導致戰爭。聯盟體系，有時被看成是戰爭的原因，但事實上也可能實際上因聯盟之交錯而有助於避免戰爭；這個體系確帶來嚴重的危險，其中最嚴重者是把地方性戰爭變成普遍戰爭之威脅。東方問題〔即所謂的巴爾幹問題〕導致高度的緊張。死亡商人（即販賣軍火的商人鼓動起戰爭）的理論和馬克斯主義者的解釋，以及遺傳理論三者皆承受不起嚴格的分析。但 1914 年公眾之軍事主義情緒和接受戰爭為解決問題之方案得被列為控狀之一部分。」⁴¹

Bullitt Lowry 總結說，「這些因素，即那些長程的原因，若無 1914 年的危機以及歐洲領袖們失敗於遏止戰爭，沒有一個會必然導致戰爭。沒有理由 1914 年的危機不能獲得像以前的危機那樣獲得解決。第一次世界大戰之

³⁹ 原書題名 *The Problem of China*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22)，今有宋譯平譯，《中國問題》（台北：有志圖書出版公司，1973 年），頁 8。

⁴⁰ Bullitt Lowry 著，章正編，*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World War One*（台北：淡江大學淡江時報社，1996 年），p. 17。詳見最近出版的三本專書：(1)John Keegan,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9); (2)Niall Ferguson, *The Pity of Wa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3)Hew Strachan, ed., *World War I: A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⁴¹ Bullitt Lowry,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World War One*, pp. 35-36.

爆發是由於政治上和軍事上人爲的失敗所造成的。」⁴²「外交上之錯估觸發第一次世界大戰」。⁴³

我們在上面已提到，張君勸對以上所言的某些方面，遠非完全無所知悉⁴⁴，而是他後來在解釋上似乎不把它們當作主要因素。其實，我們在接下來的近兩頁裡即用張君勸此方面的看法來批評他。

總之，第一次世界大戰之爆發是許多因素所造成，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民族主義和國家利益，以及在國際間缺乏大家可以共同遵守的基礎和行為規範。因此可以說第一次大戰從一開始就不是張君勸所讚頌的那樣，或是如江勇振在談張君勸相同看法時所形容的「福音」。其實，張君勸在戰後即推翻對歐戰的讚頌，並做了某些與上述 Bullitt Lowry 很接近的分析，這點多爲企圖辯護張君勸思想中之不一致性的學者所忽視。1921 年 9 月，張君勸在〈歐戰後世界外交大勢及中國之方針〉一文明明白白地寫道：

吾人試閉目思之。所謂人類國家民族者究爲何物。以吾觀之。譬如
有數十堆人群或在甲地或在乙地。或在丙地。或在丁戊己以至癸地。
此數十堆人群。雖同是人類。然所處之地。相距既遠。其中又有強
者弱者之分。各人張牙舞爪。欲得他人而甘心。於是不得已爲求平
和起見。則甲堆與乙堆相合。丙堆與丁堆相合。是之謂聯盟或協商。
此則歐戰以前外交形勢也。在一九一四年以前。所謂甲乙丙丁之聯合者。
其在歐洲。則有三國同盟。即德奧意聯合以抗法俄英也。而
法俄英之所以抗德者。則有所謂三國協商。其在亞洲。則有日英同
盟。日俄協商日法協商等。日英同盟原爲對抗俄國而起。日俄戰後。
此同盟之目的。蓋以變爲保持日英權利擴張植〔殖〕民地之同盟矣。
至於美國則超然西半球。絕不與聞舊世界種種瓜葛。戰前世界和平

⁴² Ibid., p. 36.

⁴³ Joel Colton and The Editors of Time-Life Books, *Twentieth Century* (Amsterdam: Time-Life International (Nederland) B.V. 1974), p. 49.

⁴⁴ 張君勸在數袁的十大罪狀中的第五罪狀就曾提到俄國對東歐的企圖。此外見註 14 和 32；在註 118 他認爲「富國強兵」是歐戰主因。

之所以得保者。其關係大略如是。乃焉一九一四年此各堆人群中。忽有一群抱大野心。欲打破此均勢之局。於是歐戰以起。大戰之結果。人人共知。不必贅述。要之將舊日國家系統之一大半。完全打破。如三國同盟則已破裂。昔之雄長中歐之奧匈。今則變為極小之國。至於德國。則孤立無援。四圍皆敵。不獨無聯絡友邦之力。即對付協商國之要求尚不暇給。故三國同盟之基礎。完全破壞矣。至於三國協商。俄已在局外。英法雖戰勝。在和會中始終保持一致。然以外患既無。故兩國之結合。不如昔日之密。至意大利則戰爭中雖加入協商方面。然戰後以經濟關係。對英美感情。反視戰中為差。至於中歐代奧而興的小國。若波蘭。若捷克司拉夫。若南斯拉夫。國基新立。本受英法之庇廕。當不敢自有主張。俄國既見擯於國際團體之外。其領土上自東歐以至海參崴數萬萬方里上。裂為數國。總之今日國際。是一串散珠。一盤散沙。以視戰前五雀六燕兩相等之局。不可以道里計矣。⁴⁵

夫戰爭大抵起於利害衝突……吾以為歐戰之起。有德法之仇。有俄奧之不相容。其他原因尚有種種……當一九一四年之頃。假令無德皇威廉二世其人。歐釁或者可以不開……。⁴⁶

凡兩國有大戰禍起。必起於接境之領土問題。如法德之亞洛兩省。奧賽之海華兩州……。⁴⁷

早在 1919 年秋，他也說：「特別同盟與生計競爭為世界相仇恨以成戰爭之大原因，非以特別條文廓清之，則和局決不鞏固。」⁴⁸

⁴⁵ 見張君勸，〈歐戰後世界外交大勢及中國之方針〉，《改造》，卷 4 號 1（1921 年 9 月 15 日），頁 1-2。

⁴⁶ 見張君勸，〈歐戰後世界外交大勢及中國之方針〉，《改造》，卷 4 號 1，頁 11；參見張君勸，〈社會主義思想運動概觀〉，頁 207-208。

⁴⁷ 見張君勸，〈歐戰後世界外交大勢及中國之方針〉，《改造》，卷 4 號 1，頁 13。梁啟超也說：「亞洛二州問題，總算這回大戰主要動機之一……」見〈戰地及亞洛二州紀行〉，頁 210。梁啟超的多處分析比張君勸更細緻（詳見《歐洲戰役史論》；梁啟超，〈歐戰蠡測〉），但大致上不出 Bullitt Lowry 所列的原因。

⁴⁸ 君勸，〈平和會議中威爾遜之成功與失敗〉，《解放與改造》，卷 1 號 2，頁 76。

蔡元培(1868-1940)雖也認為歐戰是「法國革命後世界上最大的事」，但他並不會有上述張君勸對歐戰之讚嘆：「歐戰是國與國的戰爭。每一國有他特別的政策，便有他特別相關的學說。我今舉三種學說作代表，並且用三方面政策來證明他。」「第一是尼采(Nietzsche)的強權主義，用德國的政策證明他。第二是托爾斯泰(Tolstoy)的無抵抗主義，用俄國過激派政策來證明他。第三是克羅巴金…(Kropotkin)的互助主義，用協商國政策來證明他。」⁴⁹在蔡元培眼裡德國一開始就是在搞強權主義，絲毫沒有正義可言，更遑論江勇振所指稱張君勸曾經要的「福音」了。

張君勸對歐戰的第一次看法是把它看成是達到富國強兵，甚至是躋身文明國之鑰。這與本文下述他對歐戰的第四個看法（更不要說觸發科玄論戰的第五個看法（本文從略））的差異真是南轔北轍，簡直像是出自完全不同的兩個人，或是完全改變了的同一個人。

就張君勸對歐戰第一個看法——江勇振所謂的「福音」——而言，他很可能是深受各國，尤其是德國，全體動員之感動，而對他早已有所認識的第一次歐戰的性質反而忽略了。這是我們評論張君勸對歐戰第一個看法的重點。

平情而論，張君勸第一次留歐時所見的德國是歐戰初期的德國。當時德國有信心可以很快地結束戰爭，而動員過程也順利，且看來好像獲得全國人民的支持。但即使是他回國後，張君勸也不至於對歐洲戰情完全隔閡，其實，他可能是對德國情形最了解的學者之一。他畢竟在德國前後（在戰前、戰爭前期和戰後（巴黎和會期間及其後））待了超過五年，因此他在「科玄論戰」時對戰爭的解釋並不能以無知來解釋，而最好的解釋可能是他的觀點完全改變了。

⁴⁹ 蔡元培，〈大戰與哲學〉（寫於 1918 年 10 月 18 日），高平叔主編，《蔡元培文集》，卷 5（台北：錦繡出版事業公司，1995 年），頁 319。

三、第二個看法（約自 1916 年初至 1917 年底）：為中國爭取權益而極力鼓吹對德、奧宣戰及其批評

我們已注意到張君勸在經俄赴德途中已意識到，並曾多次在他首次留歐時期所寫的文章裡談到，民族衝突是歐戰爆發之主要原因。這個認識雖與他把歐戰看成是中國追求富國強兵的借鑑沒有直接的衝突，但似不能應用於他主張中國對德、奧宣戰上，因為後者假設戰爭的結果會是個正義的處置方式，正如威爾遜十四點（條）原則所宣稱的。⁵⁰其實張君勸若(1)真正了解、領會他對歐戰性質之認識，並(2)清楚理解此認識是和他對歐戰之謳歌（即他對歐戰的第一個看法之主要涵義）不一致的，以及(3)注意到當時的中國並沒有能力以對德、奧宣戰而接受此歐戰的福音，則他就不該主張參戰，而得用其他方式獲得所要的成果。也就是說戰爭即使是某種福音，中國也沒有領受它的能力，因為既宣佈參戰而無法派一兵一卒前往，最終是不會有好成果的，因為這是買空賣空。更何況在張君勸的眼裡，中國「之進化尚未足列於近世國之林」！所以對德、奧宣戰是以失望而告終，一點也不奇怪。本節即在闡明此點。

張君勸第一次留歐時的重心，除了因機緣而關心歐戰外，他更關心國內的政局，尤其是討袁之役。張君勸曾回憶道：「第一次大戰開始，正為我留學柏林之年，奧匈、德、俄間如何交涉，軍人如何整裝待發，國會開會，社會黨如何通過軍事預算，均為我所目擊耳聞。是時梁任公與蔡松坡正謀西南起義，我乃決計離德。」⁵¹回國後，張君勸除了討袁外，不久更極力鼓吹對德、奧宣戰。張君勸的弟子楊永乾曾舉張君勸的鼓吹對德、奧宣戰為張的

⁵⁰ 「所謂十四條者，一、和約公開；二、海洋自由；三、生計障礙之排除；四、裁減軍備；五、殖民地之分配以民意為前提；六、俄國問題之解決；七、比利時之恢復；八、法領土之恢復及亞洛兩省之交還；九、意大利邊界之畫定以民族主義為標準；十、奧匈國中各民族之自治；十一、羅馬尼塞爾比蒙的內哥之恢復；十二、土爾其之處分；十三、波蘭獨立；十四、國際聯盟。」見君勸，〈平和會議中威爾遜之成功與失敗〉，《解放與改造》，卷 1 號 2，頁 65。

⁵¹ 張君勸，〈社會主義思想運動概觀〉，頁 261。

「二項功績」之一。⁵²因此在討論張君勸相關的看法時，我們也不得不涉及梁氏、楊氏等人對此功績的評價，以及作者對他們的評價！

1917年2月9日中國隨美國之後，藉抗議德國之潛艇戰無效而與德、奧斷交，並於同年8月2日正式宣佈對德、奧宣戰。張君勸極力鼓吹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在中國朝野大多數人反對的情況下，少數掌權軍閥在憲法研究會（即研究系）和協約國的強力遊說下做出的。對張君勸，或擴大而言，研究系在此決策中的角色，同情者一般都是加以大力肯定，而對參戰的評價也大都是正面的。⁵³這點本文是持不同看法，認為至少值得商榷。這得從張君勸自歐返國因由說起。他自己的說法是這樣的：「溯自民國四年，袁氏帝制自爲，梁任公起義西南，余自歐返國，主上海《時事新報》筆政爲之應。六年任公在京主對德宣戰，電余代勸中山南海贊同其對德主張皆不可。」⁵⁴張君勸把主戰之功歸於梁啟超，而張君勸的弟子和學者們都說梁啟超是受張君勸之影響乃起而出面主戰。張君勸是幕後軍師。張君勸之極力主張對德、奧宣戰，是因為他認爲參戰是中國爭取國際地位和權利的契機。⁵⁵梁啟超在〈外交方針質言（參戰問題）〉這篇關鍵性的文章中寫道：

我國曷爲忽然有參戰之議耶？吾儕曷爲銳意贊成此議耶？請質言之，所謂公決，所謂人道，普通義耳，所謂條件，抑附屬之後起義耳，其根本義乃在因應世界大勢而爲我國家熟籌將來所以自處之途。第一從積極進取方面言之，非乘此時有所自表現，不足奮進，

⁵² 另一功績是「幫助梁任公參與段、馮敉平張勸復辟之役。」見楊永乾，《中華民國憲法之父——張君勸》（《張君勸傳》）（台北：唐山出版社，1993年），頁32-33。

⁵³ 張公權，〈我與家兄君勸〉，頁71；王雲五等著，《張君勸先生七十壽慶紀念論文集》，頁102；蔣勛，〈張君勸先生一生大事記〉，《傳記文學》，卷14期4（1969年4月），頁84。

⁵⁴ 張君勸，〈張東蓀先生八十壽序〉，《再生》（重刊本），卷1期9（1970年9月15日），今有收在《中西印哲學文集》。今引自後者，頁1403；參見張君勸，〈我從社會科學跳到哲學之經過〉，頁64；程文熙，《中西印哲學文集》編後記，《中西印哲學文集》，頁1486；蔣勛，蔣勛，〈張君勸先生一生大事記〉，頁83；江勇振，〈張君勸〉，頁27。

⁵⁵ 江勇振，〈張君勸〉，頁27。

以求廄身於國際之林。第二從消極維持現狀言之，非與周遭關係密切之國同其利害，不復能蒙均勢之庇，必深明乎此兩義，然後問題之價值乃得而討論也。⁵⁶

引言開首「我國曷爲忽然有參戰之議耶？吾儕曷爲銳意贊成此議耶？」二句的反問語正好說明梁、張主戰須要克服他們二人之前未曾考慮的問題，甚至推翻二人曾對德國戰力之讚嘆。這個讚嘆顯然與對德、奧宣戰的主張有矛盾，因爲若德、奧會戰勝，則對它們宣戰不啻自找麻煩。因此，梁、張要主張對德、奧宣戰的前提是德、奧終將失敗才有可能。而這個前提，正如本大節下面所著重強調的，是梁、張曾經不以爲然的。其實梁、張大約到 1916 年才確定德、奧會敗，這也可從遲至 1917 年 2 月間中國政府才宣佈與德、奧斷交得到旁證。

以下讓我們先看以梁啓超所代表的梁、張二氏的宣戰輿論，然後回溯梁、張二人自己曾經說過德國不致戰敗的言論，以說明他們並沒有先見之明。

梁在上引〈外交方針質言（參戰問題）〉中，並有總結和駁斥反對派懷疑之如下八點：（一）美不參戰說；（二）俄國革命由德人煽動成功說；（三）德勝報復說；（四）俄德單獨媾和及德俄日同盟說；（五）日本乘機侵略說；（六）影響商務說；（七）影響民食說；以及（八）釀成內亂說。證之於事實，每一說都有相當的根據，其中（八）點是張君勸認爲是他鼓吹對德、奧宣戰的努力中所最遺憾的事。這點爲同情、甚至讚許張君勸在這方面功績的人所忽略。我們在下面評論時會特別指出。

除了爲中國爭取國際地位和權利的契機外，梁啓超之所以如此主張對德、奧宣戰的重要理由是，外交政策最首要是求一致，以免失信於國際，不然後果不堪設想：「平心論之，凡無論何種政策，本無極端之是非。況茲事者，本爲建國以來一非常之舉，且確含有一種冒險性質。疑議之滋，亦何足怪。惟有一義爲國人所最當注意者。一政策必首尾完具，然後有是非之可評。」

⁵⁶ 見《飲冰室合集·文集》，冊 12（35 分冊），頁 4-5；梁啓超，〈余與此次對德外交之關係及其所主張〉，《飲冰室合集·文集》，冊 12（35 分冊），頁 14-15；梁啓超，〈政局藥言〉，《飲冰室合集·文集》，冊 12（35 分冊），頁 3-4。

即如此次對德政策，抗議、絕交、宣戰，有人焉強分爲三事，以鄙人觀之，實一事而進行分三段落耳。苟無宣戰之覺悟，則自始宜勿抗議，既爲嚴重之抗議，則結果必趨宿於宣戰。事理瞭然，何勞詞費。若謂吾聊抗議焉而絕交與否，儘容商量。得毋謂德國潛艇戰略，真可以由我一紙之抗議而撤銷耶，雖極愚妄，應不至作此想。我抗議書既綴以嚴重之語，則抗議發出之一剎那頃，即爲與德國恩斷義絕之時，所謂第一步第二步者不能分也。若謂吾聊絕交而宣戰與否儘可商量，則試問絕交之本意所爲何來，既開罪於德，而復自外於美，自外於協約國，本已爲自然的孤立。今更加工以造成人爲的孤立。八面不見好，將來平和列席不可得，有敵無友，坐待處分，非喪心病狂，何至出此。故所謂第二步第三步者不能分也。由此言之，就令政府最初之提出抗議與國會之贊成絕交，果屬鑄一大錯事，至今日猶當將錯就錯，貫徹後，始就中別圖補救，況乎其本未嘗錯者耶。嗚呼，我政府我國會，其思愈所以自處矣，我國民其思所以自處矣。」⁵⁷

單就主戰而言，梁啟超的確是受到多方指責，並有辯護的文字做爲〈外交方針質言（參戰問題）〉一文的附錄出現。文云：「（附言）頗聞反對派言論以茲事集矢於鄙人之一身，目爲主動，斥爲陰謀。鄙人固知責任負責任之人也。自審爲心之所安，則謗議固夙所不避。雖然，事實殊不爾爾。吾誠爲贊成之一人。錫以主動之美稱，殊非敢承。反對者慎勿疑吾爲卸責。吾爲贊成派，故不敢掠人美也。美國照會我政府勸與彼一致行動。實二月三日事。此問題發生時，吾居天津。至八日午，當局電招入都商榷。吾以晚車往，則知已開國務會議六次。請總統訓示三次。大計已定矣。吾未蒙諮詢以前，所主張已與政府相同。及晤談後，詢悉交涉經過情形。其贊成自無待言。然吾當時猶主張稍緩發表。其理由有二：一則謂苟最後非有宣戰之決心，則抗議毋寧勿發；二則謂發抗議以前，有三方面當先行接洽。其一協約國方面，其二國會方面也；其三各省長官方面也。當時曾勸當道將此程序辦妥乃發，當道亦謂然。然某總長某參事已於八日而許美使云明日發表矣。既不便變更，

⁵⁷ 梁啟超，〈外交方針質言（參戰問題）〉，《飲冰室合集·文集》，冊 12（32 分冊）（上海：中華書局，1942 年），頁 12-13。

則惟有於抗議從，補行接洽已耳。其後總統招七人在府中會商茲事。余嘗有云，當二月九日六點鐘以前，余為最慎重之一人。當其日六點鐘以後，余為最急進之一人。此實錄也。其後余住京二十餘日，常以箇人交誼與公使團交換意見，且向國會各派要人陳說其所主張。余與茲事關係之經過略如右。將來茲事如誤國也，余不敢辭罪，苟其利國，吾不敢貪功。然吾之所信，吾固始終守之弗渝也。」⁵⁸

雖然有梁啟超以上駁斥既已斷交而不準備宣戰或參戰之不合邏輯，但仍不能平息不宣戰或參戰之聲，因而梁乃得一再為文澄清、辯護云：「乃自抗議既發之後，而國中異議轉熾然朋興，其他方面不知內容經過實情者不必論，最可怪者，當時贊成抗議慨然畫諾之人，至是忽有始終嚴守中立之說。夫自歐戰發生以來，我國過去之態度是否可稱為嚴守中立。事定之後，能否逃德人之責言，姑勿遠論。既欲嚴守中立，何故畫諾，於抗議得毋謂德人之潛艇戰略真可以由我一紙之抗議而撤銷耶？雖極愚妄應不至作此想。夫既已如是，則當知抗議發出之一剎那頃，已為我國與德國恩斷義絕之時。所謂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者，以進行之次第言之，則可若於此三步中，有所揀擇，此豈猶有揀擇之餘地者，欲擇則當於第一步未行以前擇之耳。既昂然正色以詔人曰，汝須如何如何，苟不如吾意者，則吾將如何如何。人既不如吾意焉，而吾所謂如何如何者，乃戛然而止。在箇人而有此舉動，已不能復完其人格，況於國家，乃可為是兒戲耶。吾故曰二月九日六點鐘以後，不能不取急進主義者良以此也。」⁵⁹這種以「一政策必首尾完具，然後有是非之可評」為理由的主戰看法，當然是一種理由，但由梁啟超這樣一位常「以今日的我攻昨日的我」而著稱的言論家道出來，雖頗具用心，實甚具諷刺。

而「此次外交當二月九日下午六點鐘以前，余為取慎攻主義之一人。當二月九日下午六點鐘以後，余為取急進主義之一人。」此句為批駁梁啟超

⁵⁸ 梁啟超，〈外交方針質言（參戰問題）〉，《飲冰室合集·文集》，冊12（32分冊），頁13。

⁵⁹ 梁啟超，〈余與此次對德外交之關係及其所主張〉，《飲冰室合集·文集》，冊12（35分冊），頁15。

很早就主張參戰最直接、最強的根據。但梁啟超畢竟是個熱心腸的人，也有勇氣負責到底：

此次對德外交，國人多所懷疑，其反對者尤以主動責備鄙人。鄙人雖嘗蒙當局之諮詢有所獻替，若云主動，則論者究置當局於何地，且與事實相去抑甚遠矣。雖然，鄙人固知責任負責任之人也。亦既被諮詢而有獻替矣，苟所獻替而誤國，則鬻吾肉而食之曾無所於悔。若失其主張並未貫澈，乃至事實之進行恰到吾所最反對之一步，他日倘緣此而生不良之結果，以此責備鄙人，鄙人決不任受也。夫鄙人之主張其為利國耶，為誤國耶，此本須俟諸他日之制斷。鄙人殊不敢抹殺反對說之價值，然吾說之價值，則亦願反對者勿遽抹殺之而稍加以研究也。⁶⁰

梁啟超在與德、奧斷交一事上，確是扮演極重要的諮詢角色。在〈余與此次對德外交之關係及其所主張〉一文中有詳細說明。⁶¹

針對國會與政府之間就參戰問題堅持不下一問題，梁啟超站在國家利益的立場曾對國會有慨切的呼籲。他認為既已斷交在先，若進一步則只有宣戰，以其符合當初斷交之後果警告，和向各國宣示站在同一線上反對德國對中立國採潛艇政策之抗議。文云：

……今請就目前問題而述其具體的意見，求兩造之採擇。吾以為國會方面，宜立即同意於宣戰案。吾對於此案，本為贊成派，彼反對派其或挾持成見而於吾之忠告有所不願聞。雖然，吾今所語者，非政策利害問題。吾以為國會自身為保持意見之一貫起見，在今日以完全不能不立於同意之地位。蓋既已同意絕交於前，既已絕交，則既時時皆為交戰狀態。今若反對宣戰，則前此之同意絕交，可謂毫無所取義。國會自身表示其意思之前後矛盾，非所以自保威信之道也。至於宣戰後內閣應否改造，及如何改造，此自別問題，萬不容

⁶⁰ 梁啟超，〈余與此次對德外交之關係及其所主張〉，《飲冰室合集·文集》，冊 12（35 分冊），頁 14。

⁶¹ 見該文頁 14-15。

併爲一談。若借此事爲倒閣手段，無論其以國家對外事件爲兒戲，於良心上有所不安也。而於國命自身，乃更不利。此形勢既盡人同見矣。就政府方面言之，國會能通過最善也，通過以後，內閣應否改造及如何改造，其注意仍不可怠。若其不通過，則惟有奉身而退。在今世各立憲國公例，政府不爲國會所信任，原可解散國會以再訴諸輿論。今我國既有此背戾憲政原則之硬性約法，政府既成立於此約法之下，何能強學他人。不能行其志則去，非惟立憲國之政治家宜如是，即個人進退之節亦如是也。雖去後國家危險程度或不可測，然不去焉而他方面之險豈遂能免。果有人焉，處心積慮，必欲陷國家於險，恐亦非政府一手一足之烈所能拯拔。不如自立於無過之地，或可爲將來執政示一模範，而目前政潮責任之所在，則聽國人各以其良心制之而已。吾之所希望於兩造者如此，而此希望不能不先求諸國會。蓋國會對政府不生問題，政府對國會當然不生問題也。萬一不幸而此第一希望不得達，國會對政府已生問題，然政府對國會，仍宜勿生問題。此吾之第二希望也。要之此場公案，甲對乙生問題則甲自殺，乙對甲生問題，則乙自殺，甲乙相互並生問題，則甲乙皆自殺。實則非徒乙自殺，乃甲乙共犯謀殺國家耳。嗚呼烈祖先在天之靈，其呵護之哉。（民國六年五月十日夜稿）⁶²

可見宣戰在即，中國當局仍然無法達成一致看法。在此背景下，不難想見雖有梁啟超與張君勸極力主張參戰，以期從中爲中國爭取權益，但種種此類努力在當時，甚至遲至巴黎和會上並沒有成功。當梁、張等研究系人物說服段祺瑞(1865-1936)，或被段祺瑞利用，或互相利用而對德宣戰後⁶³，他們最關心的不是如何參加歐戰，而是如何打倒政敵，以爲中國人謀福利之手

⁶² 梁啟超，〈政局藥言〉，《飲冰室合集·文集》，冊 12（35 分冊），頁 3-4。

⁶³ 有趣的是，張君勸顯然不把段祺瑞看在眼裡，因爲他雖是國際政務評論會之秘書，但他不與其會長段祺瑞交往。如此一來，又如何說服他宣戰呢？若不是段已有意如此而順水推舟，宣戰可能嗎？其實，中國之對德宣戰可說是協約國利用國內政治勢力和軍閥勾心鬥角的產物，除了企圖以參戰爭取主權的美好動機外，沒有實際理由值得贊許，因爲忽視了國內沒有參戰的條件。

段。梁、張希望聯合段打倒革命派，並謀漸進改革，而革命派則想要打倒軍閥，及和軍閥合作的研究系。⁶⁴但就在宣佈與德斷交不到四個月，即爆發了有國外勢力支持的張勸復辟事件，說明中國根本沒有參戰的能力，更何況段祺瑞參戰的目的是為了獲得借款以武力統一南北。但要以武力統一南北反而引起南北戰爭，以及軍閥混戰之加激。梁啟超後來在〈外交失敗之原因及今後國民之覺悟〉裏曾沈痛地寫道：

嗚呼！和會席上，我國竟一敗塗地矣。天下事往往集衆因而始成一果。此次失敗屬於外因者，其一則日本事前布置之周密與臨時因應之機敏也；其二則英法之不我助也；其三則美總統之受牽掣也。屬於內因者，其一則我政府之屢次加繩自縛也；其二則參戰之假公濟私有名無實也；其三則駐歐外交官之向不得力漫無布置也；其四則政府對於此次和會絕無方針也；其五則專使手腕拙劣且日事內訌失時廢事也；其六則國民批判力薄弱後援無力也。嗚呼！今大事則既去矣，國民得此噩報，其疾首扼腕灰心短氣不知何若。雖然，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吾故臚舉其致敗之由俾我國民知所憲懲焉。漢昭烈有言，事會之來，豈有底極，荷能慎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病也。⁶⁵

張君勸回顧云：

倒袁之後，繼以對德宣戰問題。我自己因為目擊歐戰初期情形，我料歐戰中德國勝利是不可能的，回來之後曾經同朋友說過中國應參加戰爭。我當時的宗旨，認定國家在國際上能立功，然後才可以取消不平等條約；徒託空言，是無濟於事的。我們讀意大利建國史，知道加富爾曾參加與意大利無關係的克利米戰爭，其目的是要在國際上立功，而後在和會裏陳述意大利的苦衷，一方面要排除奧國的壓迫，他方面要求英法人的同情。我當時所以主張對德宣戰，實含有

⁶⁴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3版第4次印刷），頁450-451，456。

⁶⁵ 梁啟超，〈外交失敗之原因及今後國民之覺悟〉，《飲冰室合集·文集》，冊12（35分冊），頁22。

此意。後來因對德宣戰政策，竟發生南北分裂，「宣而不戰」與夫西原借款的結果，這實在出乎意料之外，為提倡的人們所不及料的。此等事大家共知，可以不說了。⁶⁶

「因對德宣戰政策，竟發生南北分裂」，就是梁啟超在〈外交方針質言（參戰問題）〉中駁斥反對派懷疑八論點之第八點「釀成內亂說」之發生。梁氏曾分析說：「此說也以政治為生涯之人，多昌言之。吾卻不敢保證其必無。何也？內亂之發生，恆以政客為之中幹。若有人焉必欲借此為倡亂之口實，則求仁得仁，安所逃避。惟吾猶欲有所掬誠忠告者，則凡稍有愛國心之血性男子，終當勿以內治與外交混為一談，勿假對外問題為政爭之武器。鄙人對於此次外交政策，固為極端贊成之一人。對於一般政治現象卻亦為大不滿者之一人。然竊觀各立憲國之慣習，凡反對黨之對於政府一切匡救督責，掊擊之法，雖無施不可，若乃以不慊於現政府之故，而對於其所執對外方針劫持之使不能貫徹，是則非與政府作對，實與國家作對耳。何也？國際團體上所認之人格，乃國家也，非執政之箇人也。使國家陷於進退維谷之境，對於他國而墮其威信，此無異自剝奪其國家之人格，非仇視國家者，何忍出此。一部分之政客，如明乎此義，則釀成內亂之憂，其亦知免矣。」⁶⁷

從梁、張所擔心的內亂之輕易爆發，可見當中國北方政府把對內消除敵對勢力當做是最主要任務，而對喪權辱國之事反而不當一回事，因而梁、張等人的努力，即使是純為國家，也不能成功，因為當事人玩的是另種一政治。⁶⁸這種政治顯然與已覺醒的知識分子急切的要求相差太遠。這是本大節之所以持與一般盛讚張君勸鼓吹參戰不同看法之最直接證據，而我們發現，

⁶⁶ 張君勸，〈我從社會科學跳到哲學之經過〉，頁 66；參見下文。江勇振也曾概括了張君勸此時的活動和心情，見江勇振，〈張君勸〉，頁 29-30。

⁶⁷ 梁啟超，〈外交方針質言（參戰問題）〉，頁 12。

⁶⁸ 例如即在德國已敗相畢露，正在尋求投降期間，而距 1918 年 11 月歐戰的終局，只有一年多，中國政府居然於 1917 年 9 月 28 日接受日本的二千多萬日圓的貸款以付行政開銷，而與日本簽下「二十一條款」，使盟國在和會中無從助力，因而果然驗證了梁啟超認為最膚淺，並加以批駁的所謂國家自取破亡的道路。雖然中國實際上並沒有亡，但所激起的憤怒是之後許多政治活動，包括五四運動之爆發的導火線。

連盛讚張君勸極力鼓吹參戰的張君勸弟子程文熙也不得不引張的話云：

先生於當時〔民國六年〕，曾作感想，其辭曰：「歲云闌矣！問此一年來，所爲何事，則茫然不知所以。蓋自來救國者，未有不先治己。方今海內鼎沸，已同瓦解，求所以下手之方，而不一可得，惟有先盡其在我，此治己之謂也。」⁶⁹

這個失望之根源在於中國國情缺乏參戰的條件。歐戰爆發後，中國政府的初步希望是要限制戰區，使歐戰不致擴及東亞，因日本反對而不成功。之後，也因日本反對而收復膠澳德國租地失敗。最後只好在沒有力量真正參戰的情況下對德、奧宣戰，希望有所突破。這種種措施皆不成功。就後者而言，如何能期望派華工參戰⁷⁰即能取得所要的領土歸還和主權完整，甚至獲得戰爭勝利的果實？北京政府企圖收還膠澳的活動和建議限制區一樣，在國勢不強的情況下，殊難有成果。⁷¹限制戰區於歐洲和收回膠澳都不成功的中國政府反而要向德奧宣戰，並想從中取得利益，誠屬奢望。⁷²

現在讓我們回溯梁、張在鼓吹對德、奧宣戰上，因曾斷言德國不致敗，

⁶⁹ 王雲五等著，《張君勸先生七十壽慶紀念論文集》，《君勸言行錄》，頁 16。參見江勇振，《張君勸》，頁 30。

⁷⁰ 陳三井，〈華工與歐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52）（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 年）；陳三井，〈華工參加歐戰之經緯及其貢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4 冊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3 年 5 月），頁 385-412；頁 386 有云：「歐戰爆發，中國初採中立，後雖宣佈對德奧宣戰，但因內爭與財政及運輸上之困難，遂未真正出兵歐洲與協約國共同作戰。惟中國為履行參戰義務，曾參加日、美、英、法、義等國聯合出兵西伯利亞，並以大宗糧食輸運協約國，然貢獻最大者，厥為派遣華工二十萬人赴歐之壯舉。」又頁 412：「總之，華工乃歐戰無名英雄，對於協約國之獲得最後勝利亦有不可磨滅的貢獻。二十萬名華工之投入西歐戰場，至少使英、法兩國可以抽調同樣數目的戰鬥員開赴前敵，與聯軍人力之協助，實具『敵消我長』之功效。」「華工之參加歐戰，除供我巴黎和會代表作為反駁中國『參戰不力』的指責外，於提高國際地位似無太大貢獻；華工雖有儲蓄回國，然於中國資本的累積，實業知識的輸入以及生活水準的提高，亦少有助益。」

⁷¹ 參見黃嘉謨，〈中國對歐戰的初步反應〉一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1969 年）。

⁷² 思考 “If there is one universal human characteristic, however, it is a pervasive irrationality based on the egocentric confusion of self and other.” 見 Alan Cromer, *Uncommon Sense, The Heretical Nature of Science*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8.

不會敗，而在認識和輿論上所需克服的障礙。於此我們是一反梁氏的「以今日的我攻昨日的我」，而取「以昨日的我攻今日的我」來批評他們，因為我們發現他們兩人之前的相關看法與他們後來鼓吹參戰的主張矛盾。

首先該注意的是，張君勸直到他回國前仍是看好德國在戰爭中的表現的。1915年9月下旬，那時張君勸已接到梁啟超之號召回國討袁，但他仍準備赴英國察看「兵連禍結，未知鹿死誰手」的歐戰，然後才回國赴難。在他取道荷蘭往英的途中，他仍寫道：

居德數載，目擊其戰起後國內情形，凡軍事、財政之籌畫，無一事不臻絕頂。億兆一心，再接再厲，尤足令人起敬然。兵連禍結，未知鹿死誰手。乃於〔1915年〕九月下旬為倫敦之遊。凡所歷之國，訪其政治當局，察其社會情況，求於今世界人人所欲求解決而不得之二大問題，稍得解決之常識。二大問題者，戰局之久暫，一也；今後勝負之數〔屬〕，二也。⁷³

張君勸於赴英時道經荷蘭，訪問了該國家銀行總裁費司林博士，於訪談中張君勸不同意費氏認為自全局論之，當時的大英帝國財政之持久力勝過德國的看法。此外，張君勸在此生平第一次（1915年秋）訪英時，發覺「英國強制兵役法尚未通過，常看見沿街招兵的廣告，與德國人之以當兵為榮者，大不相同。」⁷⁴他甚至對當時的日不沒國大英帝國一時能否應付得起德國的挑戰有所擔心。在〈英軍需大臣路德喬琦氏之軍火與戰爭觀〉一文⁷⁵中，他寫道：「嗚呼！吾讀路氏言而不能無感焉。戰事之起已一年又半矣，子彈

⁷³ 張君勸，〈計費司林氏國內外金融談〉，《東方雜誌》，卷13號1（1916年1月10日），頁30。

⁷⁴ 張君勸，〈我從社會科學跳到哲學之經過〉，頁64。

⁷⁵ 「茲篇所錄，乃英國軍需大臣路德喬琦氏關於軍火與戰爭演說之要點也。以西方戰區上濠溝戰之勝負，一決於軍火之充與不充，故在英國為第一重大問題。若就戰局全體論，則不過一種之軍事教訓而已，且不過軍事教訓中之軍械教訓而已。在彼軍事政府視之，則以為至深。在我一般社會觀之，不免視為至淺。其以為深乎，其以為淺乎，非吾之所問矣。要之，則為教訓之一種，而為吾國人之所當知者也。且其所論闡揚科學之重要，推求戰爭勝敗之由，內而告戒英國國民，外而警省同盟之邦，措詞立意，又不僅在軍火一事已焉。」（見該文，頁23）。

之用，遲之九月後乃始覺察。何耶？機關鎗之用，自六月間由首相乃始發見，異哉！路氏有言開戰之日，成爲光學鏡之飢荒。豈徒軍械當獨立，凡百工業何一不當獨立哉。英號爲工業發達之國，專長工人尚不免缺乏，矧知他國乎。英操制海之權，三島無恙，故能從容籌備。非然者，其能免於俄法之續乎？至其告戒工人之語，則以社會主義浸潤人心者已久，雖有大敵當前曾不能制其競爭之烈。抑以國家未至存亡危急之境故。尚有可以爭議之餘地耶，數月來以吾所聞之英國政黨政治之狀。行將別爲文比論之。要之，則路氏所謂一掃而空者，又何日之能達哉。此吾所以謂戰事前途雖未決而有已決者矣。」⁷⁶張君勸這個1916年看法與下述梁啟超在1914年的對德國與其敵對國的比較一樣，事後都證明是錯誤的。值得注意的是，張君勸這個看法推翻了任何想要站在張君勸一邊，辯說張君勸早在1914、1915甚至1916年前即認爲德國必敗。然而，若我們根據張君勸自己後來某些可能具有合理化的追述，我們卻會覺得他甚至早在開戰後一年內已確定德國已無勝算可操！⁷⁷

更確鑿的事實是，迄至張君勸回國前夕，他對協約國之潛力是低估的，但對德國之勝利則是高估。張君勸明明寫道：「自歐戰之起，蓋一年餘茲矣。執人而問曰，最終之勝利，將誰屬之，則人必應曰，不知也。又使問曰，以戰起迄今之情況言之，德、奧勝乎？英、法勝乎？則鮮有不應曰，德、奧勝也。」⁷⁸他的理由是「曰有軍事之原因焉，而其所以致此原因者，則余所謂三國協商內部之不一致爲之也。」⁷⁹「余嘗論之此次英法外交之失，其一則事前不能制蒲爾格里使之不動；其二則事後不能使希臘出而助戰，而其總原因則由英法本無軍事上之成算。」⁸⁰「要之，今後歐洲之戰局和局。將由協

⁷⁶ 張君勸，〈英軍需大臣路德喬琦氏之軍火與戰爭觀〉，《東方雜誌》，卷13號4，頁30。張君勸這個看法與他在註91引文表示的看法有矛盾。

⁷⁷ 張君勸，〈社會主義思想運動概觀〉，頁217-219。

⁷⁸ 張君勸，〈歐東新戰區之外交潮流〉，《東方雜誌》，卷13號1（1916年1月10日），頁16。

⁷⁹ 張君勸，〈歐戰新戰區之外交潮流〉（續前期）〔二續〕，《東方雜誌》，卷13號3（1916年3月10日），頁37。

⁸⁰ 同上，頁43。

商國同戰同和之政略以解決乎？抑由德之分戰分和之政略以解決乎？此不僅兩政略之勝負已焉。乃兩交戰團之勝負所由以決也。」⁸¹總之，張君勸迄至回國時對德國之勝利有極深刻的印象，並表諸於文字。同時，他對各國之交相利用也有了解。這種了解是與他回國後鼓吹對德、奧宣戰的積極做法相矛盾，而後者也與他所謂的「外交之最後根據惟有武力」所含的「至理」⁸²不一致。張君勸當時不但不看好英、法，更不要說俄國了：「俄連戰連北，且失波蘭全境。我以西南起義之機，於一九一六年春起道西伯利亞返國。至彼得堡之日，士熙表兄詢之曰，德人何爲乎不前進乎？答曰德軍隊分配於東西戰場，藉鐵道爲東移西補之計，若大軍入俄，陷於孤懸，不復能移至西方矣。士熙表兄則爲我言，俄國因軍械之缺乏，饑寒之交迫，已不能一朝居。不一年革命之禍作，列寧氏且繼克倫司基後，主持俄政，其設施尤震動全世界。」⁸³

從上文中肯定德國在許多方面皆佔優勢的敘述裡，我們可以相當確定說，雖然張君勸沒有明顯斷定戰爭最終勝利屬誰，但可以確定的是，迄至〈歐東新戰區之外交潮流〉發表的時間爲止，張君勸認爲德國是處在有利的地位，因此在他後來翻轉過來，主張對德、奧宣戰時得先澄清並克服這點。

無獨有偶，早在歐戰爆發不久，梁啓超於 1914 年 11、12 月間，在他的《歐洲戰役史論》中也認爲德國可勝、該勝，但有趣的是他這個想法似乎沒有張君勸那樣持久。梁的斷論是這樣的：

自開戰之始，吾嘗昌言德之必勝，且言其決勝甚速。此則頗有難吾說者，吾亦幾不能自堅持。雖然，吾終信德之決不能敗也。夫以英俄法聯軍之勢，其人口多於德國數倍，其陸軍兵額多於德國數倍，其海軍噸數多於德國數倍，其財力亦過德國數倍，其地勢形便亦過德國數倍。而吾自始敢昌言德之必勝者。何也？吾觀德人政治組織

⁸¹ 張君勸，〈歐戰新戰區之外交潮流〉（續前期）〔二續〕，《東方雜誌》，卷 13 號 3，頁 51。

⁸² 同上，頁 42-43。

⁸³ 張君勸，〈史大林治下之蘇俄〉，《自序一》，頁 1。參見江勇振，《張君勸》，頁 23。

之美，其國民品格能力訓練發育之得宜，其學術進步之速，其製作改良之勤，其軍隊之整肅而忠勇，其交通機關之敏捷，其全國人之共為國家一器械而各不失其本能。凡此諸點，舉世界各國無一能逮德者。有國如此其安能敗。使德人而敗者，則自今以往，凡有國者，其可以不必培植民德，不必獎勵學術，不必蒐討軍實，乃至一切庶政，其皆可以不講矣。此非吾矯激之言，彼德國者，宜今世國家之模範。國家主義如消滅斯已耳，此主義苟一日存在者，則此模範國斷不容陷於劣敗之地。不寧惟是，以德與英法諸國戰，無異新學藝與舊學藝戰，新思想與舊思想戰，新人物與舊人物戰，新國家與舊國家戰，使德而敗，則歷史上近化原則，自今其可以摧棄矣。⁸⁴

接著他在看到雙方在開戰後數月，仍相持不下，而德國無法速勝時，反而更從雙方的軍數、軍食與軍器三大點來辯說，並認為德國至少與協約國相當，其結論曰：「夫吾儕旁觀者於兩軍決非有所偏好偏惡，且德而全勝，良非我國之福。吾何必譽美德人而為之咒其敵，惟以吾蠡測所及，謂結局恐將如是耳。吾固曰希冀吾言之不中也。」⁸⁵

雖然梁啟超當時對德國必勝的看法和種種，在當時看似有理，在事後顯得很勉強，甚至有些矛盾，但他對戰爭影響的二大評估倒好像是言中了（至少迄至蘇聯瓦解前似是如此）。他說：

若問戰後世界大勢之變遷如何，則茲事體大，益非敢對。然吾猶有逆揣者二事焉。一曰政治思想必大變動，而國家主義或遂衰熄；二曰生計組織必大變動而社會主義行將大昌也。⁸⁶

這已入張君勸第三、四個看法的範圍，下面再述。梁啟超在《歐洲戰役史論》中賭定德國必勝，若不勝，簡直沒有道理。這個看法雖然在當時或

⁸⁴ 梁啟超，《歐洲戰役史論》，收在《飲冰室合集·專集》，冊8（30分冊）（上海：中華書局，1942年），頁69-70。對照他在巴黎和會期間對國家主義之貶損——〈戰地及亞洛二州紀行〉，頁236。

⁸⁵ 同上，頁73。

⁸⁶ 同上。

有可信度，但揆諸於後來的事實，證明是有些癡人說夢。這也可從他接下來在 1919 年間自己的否定文字中看出：「我嘗敘述戰況之先，有幾句話不能不鄭重聲明。世人多以爲德國此次失敗，其原因全在內政外交，對於他的軍事，惟有讚歎佩服。其實不然。即以軍事論，德國缺點，正自不少。質而言之，在軍閥專政的國家底下，不惟別的政治辦不好，連軍事也一定辦不好。」⁸⁷這個看法與 1914 年的看法簡直是天淵之別。與他自己在 1915 年 9 月下旬仍對德國的所謂「億兆一心」之歌頌，張君勸在 1978 年才出版的回溯評價，也和梁啟超一樣，有天淵之別：

就德皇威廉二世爲人而言，他在政治上的向善的心，遠過尼哥拉二世之上。就其助奧攻塞而言，亦所以爲德國生存之計。然開戰以後，許立芬戰略的實施，海軍的備而不用，潛艇戰的有限無限，軍權與相權的爭持，皇權與議會的對抗等等，可謂國家根不大計，無一事有妥善的解決，而輕於一戰，以爲孤注之一擲。試以內部一致與持久作戰兩點衡之，則君主之不如民主，顯然易見。此乃英法所以能堅持而德奧不能者，實爲第一次大戰中的明白教訓。⁸⁸

總之，張君勸與梁啟超在歐戰初期分析德國的勢力，是肯定多於否定。⁸⁹這個了解將會使讀者在看到梁啟超、張君勸極力鼓吹對德、奧宣戰時，領會到他們所須面臨的合理化程度和說明之艱難與遲誤，因爲這涉及完全改變他們曾經有過的，但到 1916 年底或 1917 年初已證明是沒有堅實根據的看法，也說明他們雖關心時局，但也只有事後的聰明而已。

張君勸「對德宣戰之建議」這個主張當然與他留學德國時的見聞所得分不開，但並非有必然關係，因爲他留歐，尤其在德國時，主要關心毋寧是國際政治中的縱橫捭闔，以求中國和平生存之道，而不是以武力解決爭端。更重要的是，留歐時他極熱衷於外交和政治救國，並沒有真正想到要以中國

⁸⁷ 梁啟超，〈西歐戰場形勢及戰局概觀〉，《梁任公近著》，輯 1 卷上（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 年），頁 162。

⁸⁸ 張君勸，〈社會主義思想運動概觀〉，頁 224。

⁸⁹ 梁啟超，〈歐洲戰役史論〉，頁 73-76。

參戰來解決在中國的外國勢力問題。

我們在上面已提到遲至 1916 年 1 月 10 日，張君勸仍認為德、奧會獲得勝利，並在 1916 年初（2 月 10 日）發表的文章裏長篇分析協約國失敗的種種原因，雖他仍不敢斷論協約國最終必敗。這點對我們批評張君勸對德、奧宣戰很重要，且對認為張君勸老早預見德國必敗的看法提出最確鑿的反駁。

我們與其為張君勸「對德宣戰之建議」辯護，倒不如看看張君勸自己的另一個反省。這個反省除了在註 66 中提到的以外，還有如在〈歐戰後世界外交大勢及中國之方針〉所言：「吾假令承認論者之言，謂日美在短期內必有戰事起，則此事之為利為害又如何？諸君如問我美日誠有戰爭，中國應採何策？則吾極簡單之答語：中國萬不可如日俄日德戰時之守中立，當立刻與美國結攻守同盟之約，攻擊日本而已。口上答覆固易，而事實上如何辦到，則正難言。第一，吾鑒於此次對德宣戰，一派主張而一派反對之，國家因此而起分裂，此種情形，思之至今痛心。第二，日之原料，如鐵如米，取材與吾國。假令美兵尚未登中國陸地（如何登岸尚是問題）而日本已自滿洲山東占領吾北部，正未可知。自揚子江方面奪吾漢陽兵工廠，只要朝鮮海峽一日不為美兵所斷絕，則日本之接濟永無已時。糧食不斷，則日本之坐困與否，正未可知。夫戰事勝負，極不易測者也。以美勝日敗之前提，定吾之加入方針，則吾以為危險無以過此。何也？吾之攻守戰略，絕無預備，一心情願，專靠美來幫忙，吾不但不能助美，反為美人累矣。故在十年二十年以內，吾決不希望美日有戰。若在十年二十年之後，吾之海軍稍有一點準備，則又另為一事。茲不細論。要之自己無準備，專等他人算賬，算來算去，決不會算到我頭上。此謀國下策也，諸君不可不知。」⁹⁰「故吾以為凡論外交，不當僅以他國為變化元素(factor)，當問自身之變化元素如何。換言之，自己拿出方針去做，則他人政策不能不隨吾而發。若日夜替他人算賬，而毫不為自己著想，則雖算無遺策，而終無生路可得。此無前所謂外交大計，當以定本

⁹⁰ 見《改造》，卷 4 號 1，頁 15。

國政策爲第一步，而他國政略則置爲後圖之所由來也。」⁹¹「然則目前吾國外交應標定之目的安在？曰、第一財政，第二排日……」⁹²同樣是爲中國權益著想，張君勸此歐戰後不久的言詞，雖仍有不得不與他國結盟的必要，但卻少了對德、奧宣戰時所有的那種奢望。本文此大節蘊含的意義之一是：外交是內政的延續，可惜專門研究國際外交與政治的張君勸，當時在鼓吹對德、奧宣戰時居然忘了（或更正確地說不顧）此點。

四、第三個看法（約自 1918 年初至 1921 年初）：因巴黎和會之失望、山東問題之懸案、五四運動之激盪與世界思潮之影響而信服社會主義及其批評

評論了梁啓超、張君勸之力爭參戰後，我們很自然得談他們以私人身份赴巴黎和會前後對歐戰的看法。

屢挫於政治活動之後，梁啓超於 1918 年 12 月決定率領六位同僚遊歐一年。據梁啓超的說法，他們出遊的目的有二：「第一件是要想自己求一點學問，並且看看這空前絕後的歷史劇怎樣收場，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爲正在做正義人道的外交場，以爲這次和會真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國際關係根本改造，立個永久和平的基礎，想拿私人資格將我們冤苦向世界輿論伸訴，也算盡一二分國民責任。」⁹³他們在外交上是幾乎完全失望了，然而他們一行人卻見了柏格森、威爾遜以及許多哲學家、政治家和文壇領袖。

1919 年 1 月，巴黎和會開幕，共有 27 個國家正式與會，而非正式代表團則更多。這個爲處理歐洲史無前例之損失的戰爭而召開的會議，實在不能專注中國問題。⁹⁴這點當時的中國人沒有正視，反而莫名地把中國許多外

⁹¹ 見《改造》，卷 4 號 1，頁 16-17。

⁹² 同上，頁 17。

⁹³ 丁文江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編》，卷 3（台北：世界書局，1959 年），頁 533。詳見張君勸，〈我從社會科學跳到哲學之經過〉，頁 67-68。

⁹⁴ 山東權利問題只是幾十個和會所擬議要解決的問題之一，且是屬於友邦間的問題。參見梁啓超，〈巴黎和會鳥瞰〉，《梁任公近著》，輯 1 卷上，頁 152 所列問題細目。

交，甚至一些內政問題，寄託在中國人無法操控的和會上。「世界大戰告終，和會行將開始之時，列名戰勝國的中國，上下欣喜，知識分子尤為興高采烈，全國學校放假三日，舉行慶祝協約國勝利大會，提燈遊行，滿街旌旗，鼓樂喧鬧，欲呼入雲，高歌『雲消霧散，重見青天，』拆除為德國公使克林德所立的昭雪碑，改建為『公理戰勝』碑。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及教授，舉行演說會，臚舉慶祝的四大意義：一為黑暗的強權消滅，光明的互助論發展；二為陰謀派消滅，正義派發展；三為武斷主義消滅，平民主義發展；四為種族的偏見消滅，大同主義發展。未及三月，巴黎的惡耗連續傳來，有如當頭一棒，天旋地轉，青年學生尤為憤慨，以至演成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北京示威運動……在發表的宣言中，斥責把持和會的國家專逞強權，不顧正義公理，『欺凌我，壓迫我，奴隸我，』我如『不作萬死一生之呼救……則是二十世紀之賤種，無可語於人類。』在散布的傳單中，號召『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三週後示威領導人之一的羅家倫，稱這次事件為『五四運動』，遂成為通用名詞，涵義則擴大至新思潮、新文化運動。」⁹⁵

參戰帶來巴黎和會之屈辱，而後者則觸動五四運動之爆發。關於這點，張君勸提供了一般泛論五四運動爆發的人所忽略的個人見證。他說：「五四運動起於巴黎和會中中國外交的失敗，因此激起學生示威運動，要求罷免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當時我身在巴黎，所以我對於這件事情，絲毫沒有參預。但是我還記得山東不能直接歸還中國而先要交到日本人手上，這個決議成立之後，我追隨梁任公、顧少川之後曾在巴黎去拜訪過美國總統威爾遜一次。那時候威爾遜碰到國內反對國際聯盟，國外意大利和日本人同他為難，所以他臉上面帶病容而且是灰白色。梁任公力說山東是孔子的生地而且是齊桓公管仲政績展佈的地方，如山東不能交還中國，恐違民族自決的大義。中國人民一定大大失望。威爾遜不曉得青島在那裏，站起來請顧少川公使在地圖上指點給他看，人口有多少、面積有多大，可見得對於青島這個問

⁹⁵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501。

題還不大清楚。當時山東交還日本決議成立後，任公先生還在家裏請了出席和會的代表，如王克疇、顧少川等，力主張不簽字的方針，梁任公這個主張提出之後，他便到瑞士、意大利去遊歷，所以學生後來包圍代表團不讓簽字，那個時候我們已經不在巴黎了。主張拒絕簽字和約，梁任公實在是個創議的人。學生的不許代表團簽字，是不是與任公有關我不敢說，但意義是一貫的。」⁹⁶

因參戰而來的出席巴黎和會以及在會上的屈辱，是五四運動爆發的直接導火線，而五四運動之發展卻使原已在溫和中進行的文化改革不可能持續下去，而轉向政治、經濟導向的活動，以及各種運動之接踵而至。根據周策縱的研究，五四運動是一個複雜現象，它包括新思潮、文學革命、學生運動、工商界的罷市罷工、抵制日本及新知識分子所提倡的其他社會和政治活動。這種種都是由於廿一條款要求和山東問題議案所燃起的愛國情緒，以及西學的精神和熱望用科學與民主來重估傳統以建設新中國所激起的。它既不是一致性或組織嚴密的運動，而是一些思想紛歧的活動所匯合而成，可是其間並非沒有主流。⁹⁷

張君勸除了關心山東問題外，還對威爾遜的外交、巴黎和會、國際聯盟、德國革命、法國戰後政情等等因歐戰而來的發展也有評論。

張君勸在〈平和會議中威爾遜之成功與失敗〉一文對威爾遜 1918 年 1 月 8 日發佈的十四條為世界和平之綱領，既肯定其精神，但亦批評其實際失敗。

茲謹特別談及有關中國部分。1918 年 4 月間，張君勸從巴黎向國內報導曰：「此次平和會之開始，天下引領而望者，僉曰其一洗維也納會議之舊習，而與天下以共見。乃自正式會成立之日，號為五強者，強分各國為二等：其一曰普通利益之國，得出全權五人；其二為特殊利益之國，則出全權三人

⁹⁶ 張君勸，〈紀念五四運動的意義〉，原發表在上海《再生》，期 163（1947 年 5 月 10 日）；今有收在《中西印哲學文集》，冊上，此處引文引自後者，頁 364-365。

⁹⁷ Chow Tse-tsung (周策縱),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165；此處譯文引自楊默夫（節）譯，《五四運動史》（台北：龍田出版社，1980 年），頁 244。張君勸對五四的看法，可參考張君勸上引〈紀念五四運動的意義〉一文。

二人以至一人。此普通利益之國，對於一切委員會，無不與聞。特殊利益國有與聞有不與聞，而一切去畫疆分界問題，則五強高坐堂皇而判諸小弱之曲直。此五強之會議，始為十人，繼又除去日本，而降為四人，為威爾遜、克蘭孟沙、勞合佐治、與奧蘭度四氏。直以全世界問題繫千百年之安危者決於四人之手。其去梅特涅之專制者幾希？是得謂為各國間之公僕矣乎？一切議事，雖時由平和會秘書處發出正式通告，然極簡略，不足以窺見內容。」⁹⁸「此外則議和正式大會中，除全權外，報館記者得出席傍聽。然正式大會中，濟濟一堂，甲唱乙和，議和之真相不在此焉。每星期六日則法外部比氏接見外國訪員，問者千百，而答者不過一二語。除願望見顏色者，偶爾一去，而第二次則絕跡矣！且自十人會議改為四人會議後，會議既無記錄，又不許旁人參與，乃愈絕對秘密會議。英報攻之，法報攻之，而彼四人者接席而談，絕不以人言為可畏，是得謂為對於輿論之公開矣乎？」⁹⁹

張君勸的結論是：

獨至二十世紀之今，外交家以人道正義為口頭禪，乃尚有以他國領土私相授受，而結密約者，則所謂公開之程度可知矣！法國要求雪里亞也，曰有一九一七年之密約在；意大利要求亞特里亞海權也，曰有一九一五年之密約在；日本之要求青島也，曰有一九一七年之密約在。各國既已承認和約公開之說，猶復以密約為口實。其堅拒之者，獨威氏一人，而威氏則以孤立無援之故，毋奈四國何焉。¹⁰⁰總之，證以沙兒唐港之事實，則民族自決主義，可以意為伸縮。證之此次和約之成立，則大國把持一切，而國際平等之實安在？證之國際聯盟規約之真相，則萬事以國家本身為本位，豈有所謂人道正義之言者？蓋與威氏一年來大言炎炎者，無一不相刺謬者也。¹⁰¹

⁹⁸ 君勸，〈平和會議中威爾遜之成功與失敗〉，《解放與改造》，卷1號2（1919年9月15日），頁72。

⁹⁹ 同上，頁73。

¹⁰⁰ 同上，頁73-74。

¹⁰¹ 同上，頁79。

或者曰，如君之言，則威氏傾美之國力，以參加戰爭，以圖改造世界者，其失敗乎？曰是也。事實如此，不可誣焉。獨此次和約之特色，爲前世所未嘗見者，曰國際聯盟成立。自威氏十二月抵歐，迨其二月返國，傾全力以圖之者，即爲此事。因有此機構，舉所不能解決之問題，盡以屬之。如殖民地，則由國際聯盟委任一國，代爲統治。如沙兒，則由國際聯盟派五人組織委員會統治之。如裁兵問題，則由國際聯盟相度國情，確定計畫。蓋凡甲乙相爭之問題，甲曰此屬甲，乙曰此屬乙，惟二者相持不下，乃以屬之甲乙所共同組織之團體，此則此次相約條文之特色，而威氏所可認爲成功者，一也。威氏既以國際聯盟爲解決一切之關鍵，故舉和議之最初三月，專心籌備此機關。將法國所提畫界賠款等事，擱置一邊。雖法人力反對之，而威氏不爲所動，比則此次和議政策之特色，而威氏所可認爲成功者，二也。威氏成功至此而止，然亦既力竭而聲嘶矣！當四月上旬，四人會議沙兒礦及萊因河問題，法總理克氏欲吞併此二地，威氏力抗之，雙方幾於決裂。威氏下令飭華盛頓號即日來歐，以示與歐洲決裂之意，克氏卒屈服。乃改吞併爲國際聯盟代治，此次菲墨問題起，威氏挺身而出，與意代表宣戰，所以爲斯拉夫民族聲援，所以儆戒強國之強權政策，雖其卒達目的與否不可知，然義聲已振於人下矣！如是非威氏魄力之不足，主張之不堅。夫亦以曲高和寡，所懷抱者未由見諸施行耳。嗚呼！以一夫獨往獨來之理想，毅然與根深蒂固之國家利己主義奮鬥，雖所成就者，遠非吾人之所希望，然已足多矣！已足多矣！¹⁰²

梁啓超在對國際聯盟、巴黎和會、威爾遜的外交的評論上大致與張君勸一致。¹⁰³梁對維爾賽條約的總評：「這回維爾賽條約，總算得世界上空前絕後之『非科學的』『不論理的』一件公文……聚起全世界一千幾百位大政

¹⁰² 君勸，〈平和會議中威爾遜之成功與失敗〉，《解放與改造》，卷1號2，頁79-80。

¹⁰³ 詳見梁啓超，〈國際聯盟評論〉，《梁任公近著》，輯1卷上，頁264、278-280、287。

治家大學問家嘔心絞腦的做了幾個月，卻做出恁麼一篇理路不清的文章來，真是咄咄怪事！」¹⁰⁴

對張君勸而言，他「一九一六年回來之後，住在國內有兩年半。到了一九一八年同梁任公去歐洲觀察歐洲和會，任公以非正式的資格去考察歐戰情形，希望為中國爭回多少權利。在巴黎住了一年，常對吾國的五個全權代表，以私人資格，貢獻了多少意見。有時也同法國當局有所往來。等到青島問題解決，梁任公離巴黎到各國遊歷。我們從德國南方名都敏興〔慕尼黑〕到柏林道上，他忽然想起當時在遠東有名的歐洲哲學家二人，一為法之柏格森，二為德之倭伊鏗。他說何妨去訪倭伊鏗一下。第一次同倭氏見面，這位哲學家誠懇的態度，大大使我發生研究他的哲學興趣。」¹⁰⁵這個興趣導致他在「科玄論戰」時大力提倡非理性主義的人生觀，並對所謂科學主義，甚至科學的立場，加以攻擊。這是我所謂張君勸對歐戰的第五個看法，在此不贅述。¹⁰⁶我們在此只先提一下他對社會主義之著迷。他告訴我們：「可以說自一九一九年起，我即相信民主社會主義。」¹⁰⁷而在他的〈俄羅斯蘇維埃聯邦共和國憲法全文〉一文裡所附給張東蓀(1886-1973)的譯者函中，我們也可以清楚看到他對此有扼要的透露和決志：

若雪門氏，若歐溫氏，學者而非社會黨也。雖認歐洲文明已在物窮則變之日，而不明言將來之趨向。其在社會黨人，已積不能平於勞動狀況。常以單刀直入之語，布告天下曰：方今一切痛苦皆發生於二大原因：一曰政治上之帝國主義，一曰社會上之資本與財產私有主義。此等言論，深入人心者垂數十年，大戰之後，困苦視昔為尤甚，而排除此痛苦之思想亦因之尤深。人人思所以改造此狀況，而苦於無法，忽焉俄過激派振臂一呼，以試驗其主義於俄國，於是與

¹⁰⁴ 梁啟超，〈國際勞工規約評論〉，《梁任公近著》，輯1卷上，頁287。

¹⁰⁵ 張君勸，〈我從社會科學跳到哲學之經過〉，頁66。

¹⁰⁶ 科玄論戰之爆發前確有許多西方哲學家、思想家聲稱西方文明破產。但這並不意味著是東方文明之興起，或復興的機會來了，除非我們假設東西文明是對壘的。而若是東西文明是無關的或不同的，則答案就更加複雜了。

¹⁰⁷ 張君勸，〈社會主義思想運動概觀〉，頁4。

之作桴鼓應者，遍於全歐。此非過激派之所爲，足令人滿意，夫亦以人心不安於現狀之所致耳。吾於過激主義服膺者有二：一曰勞動爲人人共有之義務（憲法第三條己項），二曰排斥歐洲列強之侵略政策（憲法第五第六條）。行第一主義，可以去遊談坐食之輩。號爲讀書君子，稍知勞力之苦，庶不至以小民生命命爲兒戲。行第二主義，可以知政治上之兼併，終必陷於殺人流血，此世界大戰是爲殷鑑。此二端者，眞人類平等之理想，而斯世大同之塗轍也。吾之所不取苟同者，則其政府之組織，限於一階級（憲法第七條、第六十四條），而私有財產之廢也，皆出於強力（憲法第九條第七十九條），致不免同種相殘。試取德俄兩政府較之，則彼此優劣可以立見……蓋俄人以爲昔之代議政治爲資本階級之代表，故廢之而代以蘇維埃；德人曰，此代議政治與工人政治當謀所以調和，於是以兩院爲政治機關，以營業會議爲社會生計機關。此眞酌劑得平之道，世界所當取法，而豈列寧以強力壓迫之所爲，所能望其項背哉？吾於過激派主義之批評若是……方今中國之受病，非私有財產制度也，非資本家壓制也，非對外侵略也，非物質文明也，乃人人角逐其私之所以致耳……。

……故中國之受病，不在機器，不在物質，不在財產制度，而在人心風俗。然則將奈何？曰：以社會主義促進大多數人之覺悟，增進農工人智識，及生活之需要，是屬於物質的。同時則人格教育，責任精神，應兼籌並顧，以一掃寡廉鮮恥，趨炎附勢之風，是爲道德的。二者並進，則吾國新思想之進化，乃爲圓滿……。¹⁰⁸

關於張君勸對社會主義趨之若驚和對哲學之最終肯定，江勇振已有相

108 張君勸，〈俄羅斯蘇維埃聯邦共和國憲法全文〉，譯者原函附錄（〈與張東蓀書〉），《解放與改造》，卷1號6（1919年11月15日），頁40-42。江勇振對張君勸對社會主義趨之若驚和對哲學之最終肯定，已有相當詳細的描述大可供參考。參見江勇振，《張君勸》，頁33-41；更新、更詳細的描述可見熊自健，〈張君勸的社會主義觀〉，見劉述先生編，《當代儒學論集：挑戰與回應》（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5年），頁1-59。

當詳細的描述，¹⁰⁹茲不贅述。

張君勸是最早介紹蘇聯憲法的人，也是最早反共的人之一。張君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對社會主義的興趣和傾心，是他對中國的長遠看法的一部分。

結合本文以上二大節，我們可以說，梁、張所鼓吹參戰的結果，除了激發國內五四運動之爆發和隨之而來種種波濤外，就國際勢力政治而言，也顯示留歐五年的張君勸對整個歐洲局勢仍缺乏全面且深刻的了解，甚至是誤判。同樣情形也出現在他對中國沒有參戰條件的估價上。怪不得張君勸後來少提此方面的貢獻，反是其門人或晚輩津津樂道此事。雖然張君勸對參戰的後果感到失望，但他卻對中國的前途充滿信心。¹¹⁰這種看法與他後來回憶參加巴黎和會時受到屈辱後的想法是一致的：「一國能以自力自立起來，不怕他人不上門來請教你。」¹¹¹但要如何才能自立起來呢？他的方案就是在本節已提及，且在下節要細論的社會主義。

五、第四個看法（約自 1921 年初至 1923 年初）：為回歸中國傳統而在《國憲議》上鼓吹社會主義及其批評

巴黎和會中梁啟超扮演促成五四運動爆發角色，而張君勸則有所謂從「政治國」轉向「學問國」的歷程。¹¹²張君勸自己的觀察和表白是這樣的：「再旅歐以來，默察思潮變遷之大勢，常以學術界之大革命，已如晨曦之將達地平線上矣。百餘年來歐洲所謂學問之基礎者，其在科學則奈端之物理學也，其在哲學則康德之批判主義也，今奈端之說則愛因斯登(Einstein)起而顛覆之矣，康德之哲學系統，則柏格生從而推翻之矣，此學問之二大基礎已大變，而謂一切學術不受其影響者，未之有焉。此吾所以謂學術界大革命之將

¹⁰⁹ 江勇振，〈張君勸〉，頁 33-41。

¹¹⁰ 張君勸，〈歐戰後世界外交大勢及中國之方針〉，頁 12。

¹¹¹ 張君勸，〈我從社會科學跳到哲學之經過〉，頁 67-68。

¹¹² 同上，頁 66-67；江勇振，〈張君勸〉，頁 54、40、53。

起也，方今吾國新文化運動正在發端，應如何應此大勢而急起直追，則吾以爲凡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應訪求其主持新說之鉅子，而羅致之於東方，則一切陳言可以摧陷廓清，而學問之進步，將遠在各國上矣。」¹¹³且不說後來張君勸又自承始終是康德信徒，且最欽佩他，也不說他張君勸後來又肯定奈端之物理學，我們在這裡只想說，在對歐戰第四個看法的嬗變歷程中，張君勸企圖把第二次赴歐觀戰在德國所獲得的倭伊鏗、柏格森和杜里舒等人之人生觀和德國社會主義傳播用到中國的努力。

我們在這一大節將集中討論張君勸第二次歐遊時的心得，尤其是社會主義看法。此外更要詳細批評一般讚揚有加的《國憲議》裡的社會主義看法。

在張君勸的眼裡，「社會主義之精神安在乎？吾以一言蔽之，則社會之公益，而抑個人之私利是矣。惟其然也，故重社會之公道，而限制個人之自由；故廢私有財產，代以社會所有(Sozialisierung)制；故去財產承繼而以遺產歸之國有；故欲化私人營業而歸諸國有。德憲法第五章之生計的生活，社會主義之精神所寄，而此次革命成敗所由決也。考其各條之規定，無在非個人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之兼容並包。既曰生計生活之秩序以公道爲原則，而同時則曰工商之自由，以法律保證之；既承認私有財產矣，而同時則曰團公益計，可沒收之。」¹¹⁴稍後他又寫道：「世界之爲公產主義爲社會主義下定義者衆矣！……而要之此二主義之真精神，不外乎土地國有及生產機關之國有，此二者之不行，而欲冒公產與社會主義之名，斷斷不可。」¹¹⁵張君勸有時把社會主義與公（共）產主義分開，有時又把二者等同。如在〈德國革命論〉即是把二者分開，但在〈德國新共和憲法評〉則似乎把二者等同。而即使在〈德國革命論〉這個分開也只是程度問題。由此看來，在張君勸的眼中，社會主義與公產主義只是程度問題。因此他極力鼓吹的社會主義就不免

¹¹³ 〈附錄：〔通訊 2：〕：張君勸致講學社書〔謂倭氏不克東來講學〕〉，《改造》，卷 3 期 6（1921 年 2 月 15 日），頁 111。

¹¹⁴ 張君勸，〈德國新共和憲法評〉（一續），《解放與改造》，卷 2 號 11（1920 年 6 月 1 日），頁 4。

¹¹⁵ 〈讀《六星期之俄國》〉，《改造》，卷 3 號 1（1920 年 9 月 15 日），頁 67。

與公產主義只有程度之別，雖然這個分別是很重要的，因為張君勸從未否認自己是社會主義者。其實他是個積極的社會主義者，同時也是個堅決反共的人士——尤其是在後期。若這個程度上的堅持不守，則他的所有反共理論和相關行為皆不能成立。至於這種程度上的分別最終到底能成立不成立，似乎是個抉擇的問題，因為在邏輯上和實際上是有問題的。這個現在看來很有問題的社會主義觀是《國憲議》的理論基礎。

《國憲議》發表於 1922 年。它本是張君勸於民國七年在上海召開的國是會議中提出的一個報告。¹¹⁶ 蔣勛提供了相關背景和評價：「其時舊國會復會，制憲運動方熾，君勸先生本其對各國憲法的研究，寫成《國憲議》一書，說明何種制度，較適宜於我國，可說已早培植我國現行憲法的精神基礎。」¹¹⁷

《國憲議》是張君勸第二次歐遊從「政治國」航向「學問國」後，再次反省歐戰並為中國擬想中的憲法之藍本，是張君勸為中國國基立極之思構性文章。《國憲議》的理論基礎可說是建立在對德國社會民主主義之歌頌上。

張君勸在《國憲議》中先點出趨勢之力量，以及他所憧憬之社會主義未濟的情況。接著他提出另闢蹊徑——其實就是走社會主義道路——之必要：

吾國今後之立國，其長此隨人俯仰乎？仰將離歐美而自闢塗徑乎？歐美百年來文化之方針，所謂個人主義，或曰自由主義。凡個人才，在自由競爭之下，儘量發揮，於是見於政策者，則為工商立國。凡可以發達富力者則獎勵之，以國際貿易吸受他國脂膏，藉國外投資為滅人家之具。而國與國之間，計勢力之均衡，則相率於軍備擴張。以工商之富維持軍備，更以軍備之力推廣工商。於是終日計較強弱等差，和戰遲速，乃有亟思乘時逞志若德意志者，遂首先發難，而演成歐洲大戰。今勝敗雖分，榮辱各異，然其為人類之慘劇則一而已。於是追念往事者，悟昔日之非，謂此乃工商立國之結果，此乃

¹¹⁶ 張君勸，〈《中國民國民主憲政十講》自序〉，頁 1。

¹¹⁷ 蔣勛，〈張君勸先生一生大事記〉，頁 84。

武裝平和之結果也，一言以蔽之，則富國強兵之結果也。夫人生天壤間各有應得之智識，應為之勞作，應享之福利，而相互之間，無甚富，無赤貧，熙來接往於一國之內與世界之上，此立國和平中正之政策也。乃不此之圖，以富為目標，除富以外，則無第二義，以強為目標，除強以外，則無第二義，國家之聲勢赫赫，而於人類本身之價值如何，初不計焉。德意志雄視中歐，所特為出奇制勝之參謀部，而今安在哉！俄相威德氏奪我東清鐵道，令我北鄙無寧日，而今安在哉！國而富也，不過國內多若干工廠，海外多若干銀行代表；國而強也，不過海上多幾隻兵艦，海外多佔若干土地。謂此乃人類所當競爭，所應祈嚮，在十九世紀之末年或有以此為長策者，今則大夢已醒矣。故有裁兵之說與國際聯盟之組織，雖外交形勢不脫縱橫捭闔之故智，然對外以人類一體為依歸，對內求社會生計之公道。此世界今後之趨勢，殆無疑義者也。嗚呼！此非新說也，孔子已先今日之社會黨而言之矣。¹¹⁸

先不說張君勸的「吾國今後之立國」所要「自關〔的〕塗徑」——即社會主義——是不是就是「孔子已先今日之社會黨而言之矣」。我們在這裡得先注意到張君勸曾對「個人主義，或曰自由主義」有如此負面的評價，¹¹⁹這大概是一般以為他一生都為個人自由奮鬥的一般論者所沒想像到的。在這一大段裡張君勸先把個人主義等同於自由主義後，更進一步指出它的缺點為工商業發達、魚肉各國、彼此競爭、軍備競賽、先下手為強等等，並歸結說富國強兵是戰禍之根源。¹²⁰於此張君勸比較詳細討論了造成歐戰的主要原因是富國強兵、各國競爭，但他並沒有重提他在經俄途中所感覺到的種族衝突，

¹¹⁸ 張君勸先生遺著編輯委員會編輯，《國憲議》（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0年），頁81-82。

¹¹⁹ 至於原因，參見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著，夏道平譯，《The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反資本主義的心境》（台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1991年）。從夏氏的〈再版譯者序〉中，我們獲悉遲至1958年，為資本主義辯護的文字，如上書，仍是個忌諱的事。

¹²⁰ 類似的看法亦出現在「科玄論戰」中，見張君勸，〈再論人生觀與科學並答丁在君〉，今有收在台北帕米爾書店1980年版《科學玄學論戰集》，頁120-121。

或民族要求自主的浪潮，也沒提到與上述原因相衝突的，對德國動員之歌頌，以及歐戰對中國而言是「福音」之意義。這是為什麼本文特別提出《國憲議》加以討論的主要原因。

在這裡張君勸的主要目的是，提倡社會主義做為解決戰爭以及社會、經濟問題之鑰。為此他乃不惜堅稱富國強兵導致戰爭。他所謂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所造成的富國強兵是戰禍之根源的說法是何種理論？事實是否真的如此？其實更可信的說法該是：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強調並不見得更會侵略他國。反倒是一種專制、獨裁、飢餓和對教條的狂熱更容易導致戰爭。引文中「國而富也，不過國內多若干工廠，海外多若干銀行代表」這段話引起「科玄論戰」參戰者許多抗議，抗議它藐視個中所含對經濟重要性之茫然無視。¹²¹安貧樂道之所以不能維持，並不是人們不安於它，而是它不能使人安身立命。在這裡張君勸所說的世界大戰是因為物質文明太過發達，實是無稽之談，因為發動戰爭的並不是物質文明，而是人。

既要鼓吹民族文化自由，又要鼓吹產生於西方、在歐戰後輿論界盛行的社會主義，這兩者在許多人看來是相衝突的傾向，張君勸此時的方案是堅持說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儒家思想裡也早已有之。回歸到他所理解的儒家路上後，張氏接下來在傳統中找尋社會主義之根源。¹²²他引〈禮運〉篇並解釋曰：

貨惡其棄於地而不必藏於己，非工商雖興，而不必存私有財產之制乎？力惡其不出於身，非勞動神聖之謂乎？老有所終，非養年金之謂乎？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非盲啞學校與死傷保險之意乎？天下為公，非共和之制乎？是謂大同，非今之所謂國際主義乎？是西方社會黨之要求，與我先聖之言契合。若此其為傳會耶，其為心同理同耶，稍有識者必能辨之矣。¹²³

¹²¹ 在「科玄論戰」時，張君勸為了辯護，不接受他在這之前和之後都接受的管子所謂「倉廩實，知禮義，衣食足，知榮辱。」

¹²² 江勇振對此有相當的分析，見江勇振，〈張君勸〉，頁 43-45。

¹²³ 張君勸先生遭著編輯委員會編輯，〈國憲議〉，頁 83。幾乎相同的看法後來亦見於張君勸，〈社會主義思想運動概觀〉，頁 5。梁啟超也有類似「天下為公」的看法或理想——參見梁啟超，〈國際聯盟評論〉，頁 242-243。其實許多戰後的中國知識分子都分享

張君勸把社會主義與儒家等同，也見於他後來為中國民主社會黨親擬的黨歌歌詞，其六段歌詞中的最後兩段云：

孟言民貴，孔患不均。貨惡棄地，力出已身。

不獨子子，不獨親親。

斯為民主社會主義，吾黨之北辰。¹²⁴

比較張君勸在這裡對中國文化之頌揚，與他在幾個月前對中國文化之貶損和對歐洲文化之歡迎，真會使人吃驚。¹²⁵也姑不論在這之前張君勸也曾把儒家思想等同倭伊鏗（奧伊肯）之人生觀。即就這裡所引《國憲議》之言而論，我們要問：張君勸把社會主義等同大同理想這種比附可靠性有多少？這裡只想說，張君勸所提出的大同思想主要是從社會穩定，而非從發展而言，是靜態的，而非動態之主張。他的主張所透露的「不患寡而患不均」這種傳統農業社會的平均主義，如何與產生自對發展具有烏托邦想法、以工業為基礎的現代社會主義相配合？若歐人是陷入生產過剩之弊，則中國是陷入其相反面：生產不足，其競爭一樣激烈，甚至更激烈。

接著張君勸提出在「科玄論戰」中引起許多爭論的所謂「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之對壘性看法。他說：

我國立國之方策，在靜不在動；在精神之自足，不在物質之逸樂；

了此看法，因此可看成是種回歸傳統，重新肯定它。

¹²⁴ 王雲五等著，《張君勸先生七十壽慶紀念論文集》，《君勸言行錄》，頁 42。

¹²⁵ 對照張君勸，〈懸擬之社會改造同志會意見書〉，《改造》，卷 4 號 3 (1921 年 11 月 15 日) 中如下的文字：(1)「同此圓顱，同此方趾，二千年來之中國人，其心力之發展安在耶？其自覺性之表現安在耶？其種種式之革命活動安在耶？除孔孟之書，不知有所謂學術。除一姓興亡，不知有所謂政治。除聚族而居，不知有所謂家庭。除耕田鑿井，不知有所謂生計。幸焉海通以還，外人叩關而入，不待吾之勃羅諾之焚死，吾之格里里之入獄，吾之路德之奮鬥，而國民聞見上，固已開一新紀元矣。」(頁 3)；(2)在〈歐洲文化之危機及中國新文化之趨向〉中，張君勸的一個結論是：「據我看來中國舊文化腐敗已極，應有外來的血清劑來注射他一番。故西方人生觀中如個人獨立之精神，如政治上之民主主義，如科學上之實驗方法，應盡量輸入。如不輸入，則中國文化必無活力。」(見張君勸，〈歐洲文化危機及中國文化之趨向〉，《東方雜誌》，卷 19 號 3(1922 年 2 月 10 日)，頁 121-122)。參照後來肯定中有點批評的看法，張君勸，《社會主義思想運動概觀》，頁 9。

在自給之農業，不在謀利之工商；在德化之大同，不在種族之分。數千年閉關自守，文化停滯，生計蕭條，智識之權，操之少數，其大多數，則老死鄉里，文字不識。一言以蔽之，以農立國，既乏工藝之智識，又無物質之需求。故立國雖久，尚可勉達寡而均貧而安之一境而已。今而後則何如乎？數萬噸之大艦，往來於揚子江口矣，數萬匹馬力之發動機，日夜運轉於津滬粵漢之市場矣，工廠汽笛高鳴，聞其聲而聚散者千百人，終歲勤劬，餬口或猶不足，公司輪換日新，操其奇以積贏者千百萬，祇權予母，袖手亦獲有餘，此其強弱優劣，至為明顯，故多而不均，富而不安。殆為今後必至之勢矣。然歐洲之全盛也，大興工業，拓地海外，以貿遷之利潤澤其勞動者，而資本家得保其地盤，及其既衰，海軍之擔負，不敵工商之所獲，軍人之生事，轉為和平之障礙。海外銀行尤多，則國際之勾結尤深。雖資本家或有一二蒙其利者，以全體言之，則利不敵害也。此等法術今尙能復用乎？此等機會尙可再逢乎？故歐洲之致富政策，以植〔殖〕民政策之相輔尙可保數十年之安榮。若夫吾國，則並此而不可得。所吸收者，不外本國之資財，所剝削者，不外本國之小民。即以工商立國，其支持之年月，能有歐洲之久長乎？必不然矣。¹²⁶

這種在歐戰後極流行，甚至迄今仍是所有社會主義者常用來對所謂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是建立在十八、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發展至某一階段時的概括情況。之後，許多問題已獲解決或改善，雖新問題仍層出不窮，但已非原來批判的理論所能承載。就張君勸此時之反自由主義、反個人主義經濟制度而傾向社會主義、國家主義或甚至儒家傳統的經濟制度而言，這是十分爭議性的議題。¹²⁷自資本主義社會形成以來，就有許多反對者，其中各形

¹²⁶ 《國憲議》，頁 84。參照張君勸典型的主張：「與其洩物慾淫慾而以藥物治之，不如求其少受外誘而努力修練心身。此可說東方哲學，自有長處，不可一筆抹殺。」（見張君勸，《社會主義思想運動概觀》，頁 14-15）

¹²⁷ 後來張君勸又重視個人，並主張國家、社會與個人得結合起來。見張君勸，《社會主義思想運動概觀》，頁 15, 18, 19。

各色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者，皆預言、斷定資本主義很快就要滅亡，但迄今它不但沒有滅亡，並且繼續演化，反而是要埋葬它的種種努力和革命已先行消失，或只能無力的呼喊。

張君勸在上面似乎比較贊同以農立國，雖然他基本的立場是，以農或以工商立國皆各有優劣，但若要真做一選擇，則他願傾向於以工商立國，只不過是在社會主義原則下的工商立國：

工商之不能不發展，自然之勢也。然工商之發展，要必與社會倫理相調和。故其條件有數：曰、工人之待遇，不可不優；曰、婦女小孩之勞動，不可不限制；曰、工人之工作，當限以不得超過十時；曰、工廠應辦學校，准工人入學；曰、獨占之大工業，當收歸公有。或者以為如此行之，生產費昂貴，而國貨不能與外人競爭。嗚呼！此種口頭禪，不可不辭而闢之也久矣。以生產費為理由者，每曰吾之工業學識與夫運輸交通，遠不如人，惟恃此人工之賤，乃能以廉價之貨，勉與外人角逐市上。為此言者，以致富為國家第一目的，而他事視為第二義焉。何也，其意若曰，國家不可不急急於求富，而工人則以奴隸牛馬待之。可焉。反是者若以我所謂社會公道為出發點，則結論自然不同。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者，此類是也。難者曰：吾若不能與外人爭，則工業必敗，人民失業，而所謂社會公道者，又何從說起？我以為此亦欺人之言也。以紡織業論，歐戰後各廠所贏之利，何止五六分以上。謂減少鐘點，優其待遇，則紗廠有破產之虞。吾不信焉。又有難者曰：鐵道行政，為國有事業利害得失之明證，徒以便官僚之盤踞，安在其能利國福民。若更以大工業歸之國家，不啻以全國工業斷送於官僚之手耳。雖然，國有之制，非即官有之謂也，如英基爾特主義之說，即以同業者自勞動，自管理，而分其餘利於國家焉。如德國煤礦社會所有法草案，現有之生產者與勞動者同組織媒業公團，其精神與基爾特主義相類焉。以同業之人理同業之事，各業各為一團體，各不私其所贏，而所以獎勵同業中自發自動之習者，自有術焉。故我以為以交通行政證公有之

必腐敗者非確論也。¹²⁸

以上這一段曾是江勇振特別提出來討論的內容。¹²⁹這段引言說明張君勸想以社會公平原則來支配經濟原則的構想，而認為兩者間沒有衝突。一種社會主義制度下計劃之自由經濟可能嗎？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可能同時存在嗎？對許多人而言，實際上兩者間確有衝突，其實這也就是自由經濟原則與社會主義經濟原則間不兩立之衝突。海耶克(F. A Hayek)認為是《到奴役之路》，是《不要命的自負》。¹³⁰其他人認為該是個平衡問題，但是個極難的問題。¹³¹關於這點，張君勸在《國憲議》裡沒有直接的討論，但在它的藍本，〈懸擬之社會改造同志會意見書〉中則有詳細的討論。他一方面堅稱和陳獨秀一樣的看法，即中國不必先經過資本主義的階段，在另一方面，他有和毛澤東一樣的樂觀，即認為中國的一窮二白是實行社會主義更好的材料。他說「惟其無工業，譬如一張素紙，或黑或白，視我下筆時之主意如何。」¹³²

雖然張君勸的社會主義觀既有陳獨秀的「超越論」，也有毛澤東的全盤否定階段論的「白紙論」，但張君勸還是決定取戰後德國的模式，以德國

¹²⁸ 《國憲議》，頁 84-85。

¹²⁹ 江勇振，〈張君勸〉，頁 41-42。

¹³⁰ F. A. Hayek (海耶克), *The Road to Serfdom*, 殷海光譯，《到奴役之路》（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0 年）；F. A. Hayek, *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 謝宗林、黃耀輝、陳元保、承立平譯，《不要命的自負：社會主義的種種錯誤》（台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1995 年）。

¹³¹ Philippe Van Parijs, *Real Freedom for All: What (If Anything) Can Justify Capital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是企圖解決此問題最新的一個努力。作者在前言 (Introduction) 寫道：“One: Our capitalist societies are replete with unacceptable inequalities. Two: Freedom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此書封面上告訴我們作者的看法：“These two convictions are widely shared across the world. Yet they often seem in complete contradiction with each other. Fighting inequality jeopardizes freedom; taking freedom seriously boosts inequality. What can be done? Can the circle be squared?” “Philippe Van Parijs offers a ground-breaking solution to the dilemma. Assessing and rejecting the claims of both socialism and conventional capitalism, he presents a clear and compelling alternative vision of the just society: a capitalist society offering a substantial 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 to all its members.”

¹³² 詳論見張君勸，〈懸擬之社會改造同志會意見書〉，尤其頁 11。

威瑪憲法為師，他認為德國憲法結合了自由與計劃。堅持某種社會主義理想的張君勸，對反對意見之批駁之原則是這樣：

吾以直捷〔截〕了當之語告國人，一國之生計組織，以公道為根本。此大原則也，若有問我苟背此原則因而不能圖工業之發達則奈何？吾應之曰，世界一切活動，以人類之幸福為前提。十九世紀以來，以圖富強之故而犧牲人類，今思反之，寧可犧牲富強，不願以人類作工廠之奴隸牛馬焉。此義也，吾國人之所當奉行，而十九世紀以來急切之功利計論，則敝屣之可矣。¹³³

歐人惟不知此義，故已陷入社會革命之狀態。吾國工業發展伊始，正宜及時思患預防，一切法制之中，應以貧富懸絕為大戒，而憲法為法中之法，應於專條規定，不俟言焉。¹³⁴

既曰生計生活與公道大原則相合，而同時又補一語，曰工商業之自由，依法律規定保證之。既曰，為公共利益計，得沒收私有財產。而同時則曰，私有財產，受憲法上之保護。如是，上語為社會主義，而下語則為個人自由主義。豈非上語之所規定者，又以下語取消之。曰，就條文言之其犯此弊病昭然焉。雖然，自實際言之，一切政制上之社會公道與個人自由，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缺一不可者也。甲時代則自由重而公道輕，乙時代則公道重而自由輕。故憲法上之規定，自應留此兩要素。以為自由展舒之地。若徒有社會公道而個人自由一字不提，則專以貧富平等為目標，而個人自發自助之精神，一概抹殺矣，以一方面之獎進，而阻礙他方面，甚非所以為社會健全計焉。且條文上雖兩存，而人心之所側重，自隨時代為轉移。譬之公道原則與工商自由，雖為同種條文之規定，然自時代關係言之，盡人而知其注重之所在。故條文上之平等規定，無礙於片面的解釋，是德憲法之社會個人兼顧之法，亦有不可厚非者矣。¹³⁵

133 《國憲議》，頁 86。

134 同上。

135 同上，頁 90。

張君勸在這裡所做的是一些道德陳述。但理想之實現和理想不是同一件事。其實，對現實存在的社會組織之了解，即對理想之客觀限制的掌握，是實現任何理想之第一步。細按張君勸上述所提到的稍為具體的方案，仍無法看出其可行性。張君勸又說：

我以為工業公有，乃化私產為公產之善法也。上自國家之法律，下至國民之教育，當以貨惡其棄於地而不必藏於己之論，為全國一種訓詞。則私利之動機，自可消滅。而吾工業之進化，或者異於歐西，而別開一生面歟。若認定私有財產之制，為獎勵工商不二法門，此則於近年西歐之資本主義之失敗史，尚未洞見癥結者也。¹³⁶

「西歐之資本主義之失敗史」如此之早！承認私有財產制為獎勵工商之不二法門，是資本主義之成功，如何說是失敗史？這是何種誤解？這個矛盾的癥結，即是張君勸此時堅決反資本主義和主張社會主義計畫的態度。張君勸接著明確說，中國該取中國的精神文明，而拋棄西方文明：

敢告國人，禮運大同之論，論語不患寡而患不均之言，乃吾國文明之精粹，建國之根本也。歐美之人私其富，國私其富，內成階級之爭，外釀國際之戰，不足取法者也。吾國人而誠欲脫離歐美以創造新文明乎，當自貨不棄地財不私有始。今而後其以亦步亦趨為盡立國之能事乎？抑自覺立國之責任，別求所以自效於人類歟？吾將於吾國社會生計之組織卜之而已。¹³⁷

張君勸在《國憲議》中所極力鼓吹的社會主義思想，所依賴的德國憲法又何嘗不是西方之產物？我們再多批駁張君勸之不一致，指他此時鼓吹社會主義，並在極力批判資本主義的言論中有錯誤，不免使人覺得可能別有用心，且讓我們再看一看張君勸自相矛盾的地方，以除此慮。只不過數月前，在〈懸擬之社會改造同志會意見書〉這篇有許多《國憲議》影子，可看成是他理想社會草圖的文章中，他還對中國文化傳統有所貶損，並對歐洲文化表

¹³⁶ 《國憲議》，頁 91。

¹³⁷ 同上。

示歡迎。¹³⁸我們若把《國憲議》的主張與〈懸擬之社會改造同志會意見書〉的主張做一比較，則會發現張君勸在《國憲議》中主張模仿德國，而在〈懸擬之社會改造同志會意見書〉中則主張瑞士模式，雖然他有些基本信念不變，但這不禁使我們要問，即使是同樣原則，若用很不同的架構來實現，會否造成扭曲，甚是相反結果的問題。

介於〈懸擬之社會改造同志會意見書〉與《國憲議》，張君勸在〈德國新共和憲法評〉裡已比較過各種憲法模式：

吾嘗於世界數十國之憲法中，求其可以代表一時代者有三：曰、一七八七年之美國憲法；曰、法國第一革命之憲法；曰、德之新憲法。

美憲法所代表者，十八世紀盎格魯撒遜民族之個人主義也；法國憲法所代表者，十九世紀民權自由之精神也；今之德憲法所代表者，則二十世紀社會革命之潮流也。¹³⁹

姑且不說這裡的「二十世紀社會革命之潮流」指的德國模式，與〈讀《六星期之俄國》〉（見《改造》，卷3號1，頁61）裡的「二十世紀式的革命」所指的蘇聯模式是否一件事，若不是，則難免有矛盾¹⁴⁰；也不論張君勸自稱自己在哲學上喜歡德國的，而在政治上喜歡英國的，是否有衝突，我們要問為甚麼他認為美好的威瑪憲法反而不能持久？衡諸於近代經濟發展之軌跡，以道德公平之要求來想駕馭經濟生產之過程並不成功，反是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經濟方式最能刺激生產，以利生民，也就是說道德不能直接解決經濟問題。

話說回來，自1920年代末，張君勸確是反共的急先鋒。在《史大林治

¹³⁸ 見註125。

¹³⁹ 張君勸，〈德國新共和憲法評〉（上篇），《解放與改造》，卷2號9（1920年5月1日），頁5。參見張君勸，《社會主義思想運動概觀》，頁226-227，有關威瑪憲法的要點及當時面臨的難題。

¹⁴⁰ 其實，二十年代以後，在張君勸的政治主張裏，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尤其是他所理解的德國民族社會主義）是很不同的東西（參見張君勸，《社會主義思想運動概觀》，頁29, 31, 33），雖然他的論證有許多矛盾，而對許多人（如海耶克）而言，是認識不清，因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根本上是同一類型的思想。其中之一例證即是，大多數行社會主義的國家是由共產黨領導的，只有西歐一些所謂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不是如此。

下之蘇俄》即有許多證據。¹⁴¹可說一反他 1910 年代末、20 年代初極力主張社會主義（或甚至共產主義）的看法，至遲到了 1933 年，張已回到主張私有財產和工商自由。於此張君勸可以說以完全推翻了他在《國憲議》中贊成激進社會主義的論點，也再見不到他反對以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制度。從他後來的文字看來，他要的即是德國式的社會民主主義的經濟體制，也就是西歐許多國家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經濟體制。

同樣是經過戰爭的洗禮，張君勸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對科學的看法，卻迥然與歐戰後對科學的看法不同。在《國憲議》中他對科學能致國強民富之貶損，在「科玄論戰」中達致高峰，並形成他對科學的某種程度之否定。但自論戰以後，他卻一步步變成科學精神和應用的鼓吹者，並在抗戰勝利後要接受國民政府之委託，研究美國科學發展史，甚至翻譯了布庶(Dr. Annever Bush)所著之 *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張譯為《科學，無窮的邊界》或《科學，無涯之智》）！若我們對照張君勸在《國憲議》和科玄論戰時，對科學之批評和低估的文字，則我們可能會懷疑是否同樣一個張君勸。¹⁴²

分析這時期（即本文所說的第四個階段）張君勸的社會主義看法時，最明顯的差別在於張君勸在傳統中找根據。張君勸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即以闡揚儒家為其主要的立場，認為某種程度西化了的或復興了的儒家可以拯救中國。一句話，張君勸好像對資本主義從未有真正好感，即張君勸認為資本

¹⁴¹ 張君勸，《史大林治下之蘇俄》，頁 105-106、113-114；《社會主義思想運動概觀》，頁 2-3。張君勸批判共產主義的文字相當多，有趣的是他曾引並接受普魯東(Pierre Joseph Proudhon)、考茨基(Karl Kautsky)和托洛斯基(Leon Trotsky)的文字來批判列寧主義（參見《社會主義思想運動概觀》，頁 79-80、277-279、295）。這不免使人想到主義內之爭，無論如何激烈，是與敵對主義間之爭在性質上是很不同的事。張君勸對共產主義之批判即有此嫌。

¹⁴² 參見江日新，〈「民族復興之學術基礎」的尋求——張君勸的科學概念與研究政策〉，劉述先生編，《儒家思想於現代世界》（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7 年），頁 221-254。江氏認為即使在科玄論戰中，張君勸也沒有真正反科學，但問題是，和他一樣聰明，一樣有學問的人為甚麼會那麼嚴重地認為他在反科學？其中的一個解釋是程度的問題，著重點的不同，即張君勸認為終究而言，科學比較不重要。這是含有形而上學或人生觀的論斷。其實，西方的哲學，基本上就是建立在某種科學知識之肯定與否定上，或企圖批判和融合各種知識的努力。

主義階段是可以省略的，中國可以直接走向社會主義，因為與中國傳統的理想不謀而合。

牟宗三曾極度讚揚張君勵，說他「對於民主政體建國的政治意識，一生信守而不渝，梁任公而外，惟張君勵先生能之。他始終反對共產黨：反對它的只注意經濟平等之宗教式的社會主義之意識，反對它的唯物論，唯物史觀。他能保持西方理想主義之正音，他能毅然肯定宋明理學之價值。」¹⁴³衡諸於張君勵在《國憲議》上的主張，並不能說全對。

六、結論

Lawrence H. Keeley 在 *War Before Civilization* 上寫道：

戰事匯聚並強化我們某些最強的情感：勇敢和恐懼；逆來順受與恐慌；自私與犧牲、貪婪與慷慨；愛國心與仇外情緒。戰爭的刺激曾激化人類達到創新、應變、合作、破壞與殘忍之淋漓盡致的發揮。它是和機智與幸運相匹配之最危險的場地：沒有平和的努力能與它對失敗之懲罰相等，也沒有幾個平和的努力能超越它對成功之報酬。它仍然是人類最劇場性的活動，結合了悲劇、高貴的戲劇、情節劇、壯觀、行動、鬧劇、甚至沮喪的戲劇。戰爭展顯人類處境之極致狀態。¹⁴⁴

就歐戰而言，我們可以說：

¹⁴³ 見牟宗三，〈中國數十年來的政治意識——壽張君勵先生七十大慶〉，王雲五等著，《張君勵先生七十壽慶紀念論文集》，頁 30。

¹⁴⁴ 譯自原書 Chapter One, p. 3: "Warfare concentrates and intensifies some of our strongest emotions: courage and fear, resignation and panic, selfishness and self-sacrifice, greed and generosity, patriotism and xenophobia. The stimulus of war has incited human beings to prodigies of ingenuity, improvisation, cooperation, vandalism, and cruelty. It is the riskiest field on which to match wits and luck: no peaceful endeavor can equal its penalties for failure, and few can exceed its rewards for success. It remains the most theatrical of human activities, combining tragedy, high drama, melodrama, spectacle, action, farce, and even low comedy. War displays the human condition in extremes."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世界史之轉捩點。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將會一如往昔一般，無確計的數百萬人已死亡。歐洲窮困，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遭到致命之斬傷，即使西方國家仍未全然知覺到它。在歐洲內大規模地域之改變發生了。由第一次世界大戰觸發和型塑的蘇聯 1917 年革命，帶來了世界上第一個共產國家，而在戰後，對共產主義之反應，有時是對它之恐懼，形成了許多歐洲和非歐洲國家政治之明顯線索。在歐洲以外領受到歐洲最直接的衝擊的國家是奧圖曼帝國，它瓦解成西亞的一些新興國家。在亞洲的其他地區，帝國主義在漸漸地死亡，而在太平洋的邊緣以最新的侵略國日本重生。最後，第一次世界大戰標誌著在構築社會之觀念體系上(the idea-structure of society)的一個思想上之大轉捩點——一個分水嶺——由此而引發的波紋擴及世界各地。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世界史一轉捩點，向世界各地每一個國家，每一民族，每一人類活動投下影子。¹⁴⁵

因此張君勸對戰爭有各種不同的看法是不足為奇的。令人有興趣的是他對戰爭的看法在短期內嬗變的情形。我們可以說，張君勸開始面對歐戰時之歡欣鼓舞是源於某種強烈潮流，而他後來之反省也是源於某種強烈的潮流，雖這些潮流並不見得是中國的潮流，而是歐洲當時顯然的潮流。這說明羅素所說的思潮之巨大力量，連思想家都不能倖免。就張君勸對歐戰的看法，我們首先注意到，當張君勸首先把它看成是富國強兵，接著把它看成是躋身世界文明之鑰時，他是忽略了此戰爭的性質，以及當時已存在而他也知道的社會黨人的看法，而在他第四、第五個對歐戰的看法裡，他是忽略了第一個看法裡所強調的富國強兵，和在第二個看法裡欲躋身世界文明的思考。其實，張君勸之如此改變，多少也是因為他所曾正確理解的戰爭性質與社會

¹⁴⁵ Bullitt Lowry,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World War One*, pp. 50-51. 關於梁啟超親身體驗戰墟後的評論，見(1) 梁啟超，〈戰地及亞洛二州紀行〉；(2) 梁啟超，〈歐遊中之一般觀察及一般感想〉，《梁任公近著》，輯 1 卷上；(3) 梁啟超，〈國際聯盟評論〉。

黨人的困境，只不過有些過猶不及，因為社會黨人對歐戰的看法在開始時是有所保留的，而張君勸則沒有保留，可能是因為他不是身處參戰國家中的社會黨人。在第四次看法裡，他在某些方面反比社會黨人更激進，例如幾乎沒有社會黨人像他那樣曾有某種反科學（尤其是反科學應用）的態度。

張君勸對歐戰的第一個看法和第四（第五）個看法簡直南轅北轍。在第一個看法裡，他對科學應用，更遑論科學精神，沒有絲毫的批判。在第四（第五）個看法裡，他對科學精神，更遑論科學應用之批判，達致高峰。此外，他在第一個看法裡，對社會主義雖有欣賞，但大皆是止於理解和注意的階段，但到了第四（第五）個看法時，則一反過去對科學應用之歌頌，轉而歌頌社會主義。

至於介乎其間的第二、第三個看法，以第二個看法受時空的限制最大，因為它大致限於權衡時局的判斷，第三個看法則已含有第四個看法之雛型，雖它也與時局有密切關連。張君勸在 1916-1917 年間主張對德、奧宣戰，想藉參戰謀中國之國際地位和收回租借地主權，也是近乎徹底失敗。這事說明他對歐戰沒有全面的了解，也對中國情勢掌握不清，或甚至有浪漫的孤注一擲的心態。總之，在軍閥恣睢的情況下，就對德、奧宣戰而言，我們發現張君勸的弟子們誇大了張君勸在實際政治活動上的角色，而一般研究張君勸的學者則受此影響。蔣勛、楊永乾二人顯然是把張君勸相關的做法當作張的事功來看待，其他學者亦大多採如此看法。但值得注意的是，張君勸對他極力鼓吹中國參戰的結果卻感到失敗。若我們再配合因和約失敗所導致的五四運動，以及其他後續事件和歷史發展，則張君勸本人在回顧時不免噓唏之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綜觀張君勸的四個看法，我們雖可以辯護說，其嬗變皆有當時的情勢和思潮的軌跡可尋，但問題是張君勸在提出一看法時所想捕捉的情勢和思潮並一定就是主流，所以會有看法上的嬗變。但嬗變後的看法又被緊接著而來的新情勢和思潮的發展所推翻。

羅素在 1916 年歐戰期間寫的《社會重建原理》(*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¹⁴⁶，以及上述已提及的《戰時的正義》二書，雖有許多批評科學應用和詛咒戰爭的言論，但若他的讀者基於此即斷定羅素認為(1)科學是導致戰爭的元凶，(2)西歐人要放棄他們的精神文明而要向東方尋出路，顯然是誤解了這兩本書的訊息。歐戰後，羅素隨工黨代表團親睹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他在失望之餘，於 1920 年 10 月 12 日至 1921 年 7 月 1 日間來到中國講學訪問，並在回國後寫了《中國問題》一書。¹⁴⁷此書確有許多支持張君勸在《國憲議》中維護中國文明精神的地方，也批判了一些科學之不當應用，但對張君勸式的科學的批判，嚴格說來卻沒有任何真正的助力。¹⁴⁸羅素寫道：

中國將要追尋的目標，不僅對中國，對全世界都很重要。由現在中國人復興文化的這種精神，只要外國人不干涉破壞，是很可能發展一種比世界上任一種已知的文化都要優秀的新文化。年青的中國人應該時刻為念的是：保留溫文爾雅，坦白公正，愛好和平這些中華民族的天性，結合西方的科學知識並應用於中國的實際問題上。這些實際的問題有兩類：一是起自中國的內部情況，另一是由於國際的形勢而產生。前者包括教育、民主政治、消滅貧窮、保健和衛生設施、饑荒的防止等等。後者包括健全的政府、發展工業、修改條約和收回租界港灣（這點可以參考日本的前例），最後是建立強大的軍隊足以抵抗日本的侵略。這兩類問題的解決都需要西方的科學。可是並不需要西方的生活哲學。¹⁴⁹

與本文上述所呈現的張君勸看法對照，即可見張君勸這類型的中國知識分子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態度和羅素非常不同，羅素是和平主義者，且從此觀點來看問題，而中國知識分子雖很能接受對西方文明的批判，但是有選

¹⁴⁶ 羅素原著，鄭緯民譯，《社會重建原理》（台北：世界文物出版社，1973 年）。

¹⁴⁷ 見註 39。

¹⁴⁸ 參見宋謙平譯，《The Problem of China》，《中國問題》，頁 3、7、39-40、67-69、222-223 等。

¹⁴⁹ 同上，頁 229-230。

擇性的，或是並不是全盤照收羅素的看法，其選擇也並非羅素或歐戰的影響一語所能涵蓋殆盡。張君勸即是其中一個。他此時失去了對理性之信仰，或更正確地說，他確定了對理性的懷疑。張君勸曾一時欣賞動的哲學，因而欣賞、訴諸非理性和感性。

總的說來，1910 年代至 1920 年代間，張君勸積極投入於實際政治活動，如反袁的活動以及鼓吹參戰，並針對這些加以反省。在歐戰之反省上，是對社會主義的興趣。在那個對社會主義普遍狂熱的年代，張君勸很自然地對各種社會主義思潮有興趣，問題是他做了些甚麼選擇？

有個長時期，至少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迄蘇聯的瓦解，一般自認進步的知識分子對傳統的民主、自由放任的民主、所謂資產階級的民主深不為然，認為社會主義比它好且優越，可以取而代之。溫和的認為可以調和兩者，激烈的則要全盤推翻它，取而代之的最一般的思想是社會主義，以及形形色色的反自由主義、反個人主義和反資本主義的看法。可以說張君勸一方面傾向於德國模式，但又具有濃厚傳統平均主義的色彩，或以傳統的立場來看歐戰的影響，反映到《國憲議》則形成他既傾向於某種國家主義、民族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傳統的大同思想和社會主義之大混合，但卻對資本主義一向沒有好感。可以說張君勸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反應，最顯著的一點是對社會主義的興趣，以及對資本主義之態度，這是他對中國的長遠看法的一部分。

反對科學和西方文明的人對西方戰後的反思，只襲取他們對其文明負面的文字或看法，而完全忘了戰後也是新希望高漲和重建的熱情十分投入的時代，最顯著的是威爾遜的十四點¹⁵⁰世界和平原則，是要為民主自由開創創新世界。無論如何，這些原則不可能是對西方文明失去信心。此外，國聯之創議更是此計劃之具體進行。¹⁵¹雖然不太成功，但終於達致第二世界大戰後聯合國之成立。總之，每經一戰或一浩劫，西方文明都有能力重整旗鼓，並在

¹⁵⁰ 君勸，〈平和會議中威爾遜之成功與失敗〉，《解放與改造》，卷 1 號 2，頁 65-80，對十四點之詳細評價。

¹⁵¹ 參見梁啟超，〈國際聯盟評論〉，頁 239-286，對它中肯且具有洞識的分析和評價。

吸取教訓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比較可以接受的新秩序。從所建的新秩序中，並不見得有以他種文明取代原有文明之再創的想法和做法。¹⁵²而事實也說明西方文明的活力並不弱於其他文明，其實它比其他文明更加有活力和衝力。至於欣賞與否，或接受不接受，則是另一回事。

¹⁵² 參考德貝吾(J.G.De Beus)著，殷海光譯，《西方之未來》（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0 年），一書對且里列夫斯基、史賓格勒及陶英貝三人歷史哲學之批評。此外，亦參見 William H. McNeill, *The Rise of the West*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3) 一書。

徵引書目

一、專書

1. 王雲五主持，《東方雜誌全部舊刊總目錄》，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年。
2. 丁文江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編》，卷3，台北：世界書局，1959年。
3. 江勇振，《張君勸》，見於王壽南總編輯，《中國歷代思想家》，冊10，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
4. 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著，夏道平譯，《The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反資本主義的心境》，台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1991年。
5. 張君勸，《中華民國民主憲法十講》（1946年初版），台北：商務印書館，1971年。原書出版於1947年。
6. 張君勸，《史大林治下之蘇俄》（1933年初版），台北：商務印書館，1971年。此書原出版於1933年。
7. 張君勸，《社會主義思想運動概觀》（講於1967年），台北：張君勸先生獎學金基金會，1978年。
8. 張君勸先生遺著編輯委員會編輯，《國憲議》（原發表於1922年），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0年。
9. 梁啟超，《歐洲戰役史論》，《飲冰室合集·專集》，冊8（30分冊），上海：中華書局，1942年。
10.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3第4次印刷。
11. 陳三井，《華工與歐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52)，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年。
12. 章錫琛、錢智修、高勞、甘作霖、胡學愚合編，《歐戰發生史》，東方

- 文庫第四種，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年12月。
13. 程文熙彙集，〈君勸言行錄〉，收在王雲五等著，張君勸先生七十壽慶紀念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張君勸先生七十壽慶紀念論文集》，台北：張君勸先生七十壽慶紀念論文集編輯委員會，1956年。
 14. 楊永乾，〈中華民國憲法之父——張君勸〉（《張君勸傳》），台北：唐山出版社，1993年。
 15. 漢寶德譯，《文明的躍昇》(*The Ascent of Civilization*)，台北：景象出版社，1977年，版5。
 16. 德貝吾(J.G.De Beus)著，殷海光譯，《西方之未來》，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
 17. 羅素原著，楊耐冬譯，《懷疑論集》，台北：志文出版社，1995年再版。素原著，太朴譯，《戰時之正義》，上海：商務印書館，1921年。原書（即*Justice in Wartime*）出版於1916年。
 18. 羅素原著，鄭緯民譯，《社會重建原理》，台北：世界文物出版社，1973年。
 19. Alan Cromer, *Uncommon Sense, The Heretical Nature of Science*,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0. B. Russell, *The Problem of China*,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22. 今有宋謫平譯，《中國問題》，台北：有志圖書出版公司，1973年。
 21. Bullitt Lowry 著，章正編，《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World War One》，台北：淡江大學淡江時報社，1996年。
 22. Chow Tse-tsung (周策縱)，*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楊默夫(節)譯，《五四運動史》，台北：龍田出版社，1980年。
 23. F. A. Hayek (海耶克) 原著，《The Road to Serfdom》，殷海光譯，《到奴役之路》，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0年。
 24. F. A. Hayek 原著，《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謝宗林、

黃耀輝、陳元保、承立平譯，《不要命的自負：社會主義的種種錯誤》，台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1995年。

25. Hew Strachan, ed., *World War I: A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6. J.S.Mill, *Autobiography*, ed. by Jack Stillinge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27. Joel Colton and The Editors of Time-Life Books, *Twentieth Century*, Amsterdam: Time-Life International (Nederland) B.V. 1974.
28. John Keegan,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9.
29. Lawrence H. Keeley, *War Before Civi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30. Niall Ferguson, *The Pity of Wa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31. Philippe Van Parijs, *Real Freedom for All: What (If Anything) Can Justify Capital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32. Robert Heinrich Lowie (羅伯特·路威) 原著，呂叔湘譯，《文明與野蠻》，北京：三聯書店，1986年北京第2次印刷。此譯本曾於1935年出版。原書英文名題為 *Are We Civilized: Human Culture in Perspectiv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29.
33. William H. McNeill, *The Rise of the West*,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3.

二、論文

1. 司馬榕，〈聰明一世、糊塗一時的科學家？〉，《科技報導》，期178，1996年10月15日，版21。此文有缺漏，補遺見《科技報導》，期179，1996年11月15日，版17。
2. 江日新，〈「民族復興之學術基礎」的尋求——張君勸的科學概念與研究政策〉，劉述先主編，《儒家思想於現代世界》，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哲學研究所籌備處，1997年。

3. 牟宗三，〈中國數十年來的政治意識——壽張君勸先生七十大慶〉，見《張君勸先生七十壽慶紀念論文集》。
4. 高勞，〈歐洲戰亂與社會黨〉，《東方雜誌》，卷 13 號 2，1916 年 2 月 10 日，頁 47。
5. 張公權，〈我與家兄君勸〉，《傳記文學》，卷 14 期 4，1969 年 4 月。
6. 張君勸，〈平和會議中威爾遜之成功與失敗〉，《解放與改造》，卷 1 號 2，1919 年 9 月 15 日。
7. 張君勸，〈俄羅斯蘇維埃聯邦共和國憲法全文〉，譯者原函附錄（〈與張東蓀書〉），《解放與改造》，卷 1 號 6，1919 年 11 月 15 日。
8. 張君勸，〈德國革命論〉（續），《解放與改造》，卷 2 號 4，1920 年 2 月 15 日。
9. 張君勸，〈德國新共和憲法評〉（上篇），《解放與改造》，卷 2 號 9，1920 年 5 月 1 日。
10. 張君勸，〈德國新共和憲法評〉（一續），《解放與改造》，卷 2 號 11，1920 年 6 月 1 日。
11. 張君勸，〈紀念五四運動的意義〉，原發表在上海《再生》，期 163，1947 年 5 月 10 日；今有收在程文熙編，《中西印哲學文集》（二冊），冊上，台北，學生書局，1981 年。
12. 張君勸，〈哲學家的任務〉，《再生》，期 248，1949 年 1 月 24 日。
13. 張君勸，〈張東蓀先生八十壽序〉，《再生》（重刊本），卷 1 期 9，1970 年 9 月 15 日。今有收在《中西印哲學文集》。
14. 張君勸，〈計費司林氏國內外金融談〉，《東方雜誌》，卷 13 號 1，1916 年 1 月 10 日。
15. 張君勸，〈歐東新戰區之外交潮流〉，《東方雜誌》，卷 13 號 1，1916 年 1 月 10 日。
16. 張君勸，〈歐戰新戰區之外交潮流〉（續前期）〔二續〕，《東方雜誌》，卷 13 號 3，1916 年 3 月 10 日。
17. 張君勸，〈英軍需大臣路德喬琦氏之軍火與戰爭觀〉，《東方雜誌》，

卷 13 號 4，1916 年 4 月 10 日。

18. 張君勸，〈歐洲文化之危機及中國新文化之趨向〉，《東方雜誌》，卷 19 號 3，1922 年 2 月 10 日。
19. 張君勸，〈關於杜里舒與羅素兩家心理學之感想〉，《東方雜誌》，卷 20 期 8，1923 年 4 月 25 日。
20. 張君勸，〈讀《六星期之俄國》〉，《改造》，卷 3 號 1，1920 年 9 月 15 日。
21. 張君勸，〈附錄：〔通訊 2：〕：張君勸致講學社書〔謂倭氏不克東來講學〕〉，《改造》，卷 3 期 6，1921 年 2 月 15 日。
22. 張君勸，〈歐戰後世界外交大勢及中國之方針〉，《改造》，卷 4 號 1，1921 年 9 月 15 日。
23. 張君勸，〈懸擬之社會改造同志會意見書〉，《改造》，卷 4 號 3，1921 年 11 月 15 日。
24. 張君勸，〈張東蓀著《思想與社會》序〉，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 年。
25. 張君勸，〈再論人生觀與科學並答丁在君〉，有收在台北帕米爾書店 1980 年版《科學玄學論戰集》。
26. 張君勸，〈我從社會科學跳到哲學之經過〉，原載《宇宙旬刊》，卷 3 期 11，1935 年 12 月 25 日。今引自程文熙編，《中西印哲學文集》（二冊），冊上，台北：學生書局，1981 年。
27. 梁啟超，〈巴黎和會鳥瞰〉，《梁任公近著》，輯 1 卷上，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 年。
28. 梁啟超，〈西歐戰場形勢及戰局概觀〉，《梁任公近著》，輯 1 卷上，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 年。
29. 梁啟超，〈國際勞工規約評論〉，《梁任公近著》，輯 1 卷上，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 年。
30. 梁啟超，〈國際聯盟評論〉，《梁任公近著》，輯 1 卷上，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 年。

31. 梁啟超，〈歐遊中之一般觀察及一般感想〉，《梁任公近著》，輯 1 卷上，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 年。
32. 梁啟超，〈戰地及亞洛二州紀行〉，《梁任公近著》，輯 1 卷上，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 年。
33. 梁啟超，〈外交方針質言（參戰問題）〉，《飲冰室合集·文集》，冊 12（32 分冊），上海：中華書局，1942 年。
34. 梁啟超，〈歐戰蠡測〉，《飲冰室合集·文集》，冊 12（33 分冊），上海：中華書局，1942 年。
35. 梁啟超，〈各國交戰時之舉國一致〉，《飲冰室合集·文集》，冊 12（33 分冊），上海：中華書局，1942 年。
36. 梁啟超，〈外交失敗之原因及今後國民之覺悟〉，《飲冰室合集·文集》，冊 12（35 分冊），上海：中華書局，1942 年。
37. 梁啟超，〈余與此次對德外交之關係及其所主張〉，《飲冰室合集·文集》，冊 12（35 分冊），上海：中華書局，1942 年。
38. 梁啟超，〈政局藥言〉，《飲冰室合集·文集》，冊 12（35 分冊），上海：中華書局，1942 年。
39. 陳三井，〈華工參加歐戰之經緯及其貢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4 冊上。黃嘉謨，〈中國對歐戰的初步反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9 年。
40. 葉其忠，〈從張君勸和丁文江兩人和〈人生觀〉一文看 1923 年「科玄論戰」的爆發與擴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5，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 年 6 月。
41. 葉其忠，〈1923 年「科玄論戰：評價之評價」〉，《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 年 12 月。
42. 熊自健，〈張君勸的社會主義觀〉，見劉述先主編，《當代儒學論集：挑戰與回應》，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哲學研究所籌備處，1995 年。

43. 蔣勣，〈張君勣先生一生大事記〉，《傳記文學》，卷 14 期 4，1969 年 4 月。
44. 蔡元培，〈大戰與哲學〉（寫於 1918 年 10 月 18 日），見高平叔主編，《蔡元培文集》，卷 5，台北：錦繡出版事業公司，1995 年。
45. B.Russell, “Preface” to his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55.
46. Isaiah Berlin, “Nationalism: Past Neglect and Present Power” in *Against the Currents: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1982, ed. with a Bibliography by Henry Hardy,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oger Hausheer.
47. John Horne, “Socialism, Peace, and Revolution, 1917-1918” in Hew Strachan, ed., *World War I: A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